



旅游演艺产品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

THE INNOVATION OF TOURISM PERFORMING ARTS PRODUCTS— TAKE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雷雅淇^{1*}, 徐志坚²

Yaqi Lei^{1*} and Zhijian Xu²

¹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研究生院

²中国南京大学商学院

¹Chinese Graduate School,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Thailand

²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25368630@qq.com

摘要

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的旅游演艺产品迎来了繁荣期,旅游演艺的节目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多样,节目规模也逐渐变大。在消费需求和相关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旅游演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已经占据了旅游市场的半壁江山;但是,也存在着旅游产品缺乏吸引力、旅游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面对我国旅游演艺的发展现状,如何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旅游演艺产品的升级和创新成为当前旅游演艺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旅游演艺产品创新的动力机制、机理流程和扩散模式的研究,为贵州省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实践和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本研究采用旅游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结合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需求层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系统动力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实地观察、深入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旅游演艺产品的构成维度、创新引因及主要利益者等数据,运用扎根理论、灰色关联分析、系统动力模型和创新扩散模型,对贵州省旅游演艺产品的发展规律和创新方向进行有益的探索。并分析得出创新的驱动力无论是内部驱动力还是外部驱动力,都会对旅游演艺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但是影响程度的高低还要受到各方面环境的影响,所以旅游演艺企业应根据市场的不断变化以及自身的能力选择适合本企业的驱动力,从而保证创新活动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 旅游演艺 产品创新 扎根理论 动因 机理

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China's tourism performance products have ushered in a prosperous period, with increasingly diverse and diverse forms of program expression, and the scale of programs gradually increasing. With the support of consumer demand and relevant policies, China's



tourism entertainment industry has developed rapidly, occupying half of the tourism market; However, there are also issues such as the lack of attractiveness of tourism products and the imperfect tourism industry chain. Facing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tourism performance in China, how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and innovation of tourism performance produc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current tourism performance research. This article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performance products in Guizhou Province by studying the driving mechanism, mechanism process, and diffusion mode of innovation in tourism performance products. This research adopts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tourism,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d combines Product lifecycle theory,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theory, system dynamics theory, stakeholder theory. Through field observation, in-depth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and other methods, this research collects data on the composition dimensions, innovation causes and main stakeholders of tourism performance products, and uses Grounded theory, gray correlation analysis The system dynamic model and innovation Diffusion model are beneficial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law and innovation direction of Guizhou tourism performance products. And it is analyzed that the driving forces of innovation, whether internal or external, will have an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of tourism entertainment enterprises. However, the degree of impact is also influenced by various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refore, tourism entertainment enterprises should choose the driving force suitable for their own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continuous changes in the market and their own capabilitie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Keywords: Tourism Performance, Product Innovation, Grounded Theory, Motivation, The Mechanic

引言

随着旅游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化，旅游市场快速变革，人们的出游体验不断被刷新。人们的旅游也由“看山看水看风景”的旧时代开始跨入“观文品史、体验生活”的新时代。为适应游客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旅游需求，以中国的旅游演艺为例，短短十五年时间，中国的旅游演艺市场就经历了从剧院式传统演出到实景山水演出再到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式演出的巨大变革。如今国内旅游演艺研究呈上涨趋势，但多关注基础理论和具体项目，采用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索旅游演艺游客体验是一种新的尝试，仍有一系列问题尚待解决。旅游演艺产品是综合性极强的关联性产业，而目前关于旅游业态的研究也仅仅是限于概念、类型、演化机理理论研究等，关于旅游演艺多从概念与产品角度展开，对旅游演艺产品的研究则比较少见。本文研究得出旅游演艺产品的构成要素，将会丰富旅游业态的研究内容；从旅游演艺产品自身构成要素的角度对贵州省旅游演艺产品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将会产生一定的理论价值，为以后专门针对旅游演艺产品进行研究提供参考。从旅游演艺企业层面上来看，我国目前出现的旅游演艺产品多达 200 多台，旅游演艺企业处于同质化、低层次竞争的状态。对贵州省的旅游演艺

产品的研究，认识清楚贵州省旅游演艺产品发展中组织形式、经营方式、旅游产品和经济效益四大方面的发展情况，对于其自身变革，更好的应对市场变化与消费者需求意义重大。深入分析贵州省旅游演艺产品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对促进贵州省旅游演艺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贵州省旅游演艺业竞争力提供一定的决策支持。

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对旅游演艺产品创新的动力机制、机理流程和扩散模式的研究，为贵州省旅游演艺产品的开发实践和健康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本研究采用旅游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结合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需求层次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系统动力学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实地观察、深入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旅游演艺产品的构成维度、创新引因及主要利益者等数据，运用扎根理论、灰色关联分析、系统动力模型和创新扩散模型，对贵州省旅游演艺产品的发展规律和方向进行有益的探索。

文献综述

研究现状

目前对于旅游业态的概念，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其构成要素进行了钻研，这些研究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均把某一类具体的旅游业态作为研究对象，在这里列举极为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以作参考。首先是徐凌和李忠华（2022）通过分析旅游业态的概念和集聚型旅游业态的演化规律，从构成的角度对集聚型旅游业态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并且对余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旅游业态的管理模式、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进行了着重解析。杨嵘和金妍（2020）通过对中国旅游演艺市场进行 SWOT 分析来探索中国旅游演艺市场的发展策略；杨絮飞（2020）通过对中国旅游演艺产业的发展历史进行总结，提出旅游演艺发展经历从政府接待到商业运作的历程，发展到目前的状态下需要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表现为国有和民营作的多元合格局。叶志良（2020）、姚延波和刘亦雪（2019）、赵春莲 .et al（2022）、张伟伟 .et al（2022）在对国内大型旅游演艺产品发展概况梳理的基础上，采用案例研究法针对某一地区旅游演艺产品发展条件、现状、问题进行分析，为该地区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

Morehead .et al（2022）认为旅游行业的创新模式包括产品创新、程序创新、信息处理创新、管理创新与组织创新五种类型，这些创新有的是受外部环境影响，有的是从企业内部开始的，有的是从企业外部开始的；Austin .et al（2022）认为旅游业态目前面临的状况，一是更多的旅游者倾向于更加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动的去接受，二是通信技术的发展对旅游业传统的服务方式提出挑战；以西班牙的巴利阿里群岛研究饭店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发现其创新受到环境的影响程度大；Pabel .et al（2020）认为旅游演艺中歌舞表演具有真实性的特点，旅游演艺可以真实的反应着某一地区社会风貌而且还体现出旅游演艺活动的创造性。旅游演艺可以展示某地历史文化，其对于旅游遗产地来说也是展示文化遗产的一种方式。Ba, D., & Song, L（2022）



对国内外一些旅游景点的旅游演艺进行研究，提出在旅游地发展旅游演艺是旅游地参与旅游生产活动，宣传旅游目的地的有效手段。

文献综述

综上所述，国内对于旅游业态的研究开始于 2005 年，研究至今成果显著。最初的研究是基于旅游演艺产品这个大范围的概念展开，由大到小，逐步细化，首先辨析了“**旅游业态**”的概念，接着是介绍旅游行业中出现的新型的**旅游业态**；随后逐渐开始加强了对旅游业态理论方面的研究，如：旅游业态的概念、类型、构成要素方面的研究；其后发展至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研究不同类型的旅游业态，进而逐渐的细分发展至具体的旅游业态的研究并结合以实证，更加的注重研究的应用性与对策性。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专门针对旅游演艺产品进行实证研究的还不多见，且从研究内容上看，多为研究具体的旅游产品与游客感知价值等变量关系的研究、旅游业态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方面的研究，但是并没有从业态的角度进行综合，专门对某一类型的旅游业态自身内容进行要素构成方面的研究，从旅游业态自身发展的角度对旅游演艺产品进一步发展进行思考，这也是本次研究着力解决的问题。

研究方法

1. 扎根理论方法

Glaser&Strauss 于 1967 年提出了一种专门分析质性材料的有效方法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这是一种通过系统化地收集和分析原始数据，进而归纳整理出新的理论框架的质性研究方法。Glaser进一步指出“**扎根理论**是提出一个自然呈现的、概念化的、互相结合的、由范畴及其特征所组成的行为模式”。

2. 传统机理模型

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旅游演艺产品创新的动态机理模型，并根据实地调查结果详细论述了该模型的构成要素，分析了要素之间的作用机理，以及要素之间促进产品创新的作用进程。以大量的原始数据为基础，对其进行一步一步的解码分析，在解码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主观因素，而且，它还需要在反复的数据验证和补充中，不断地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最终得出的研究结论。

3. 研究设计

自Glaser和Strauss提出**扎根理论**方法论以来，学术界已经有三个既有联系又不完全相同的研究版本出现。虽然对于版本选择的纷争一直存在，但是目前，Strauss和Corbin的**程序化版本**是迄今为止应用最为广泛的。因此，扎根理论的核心是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其中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是同时进行、互为补充的，这一过程包含了理论的演绎和归纳。扎根理论的研究流程如下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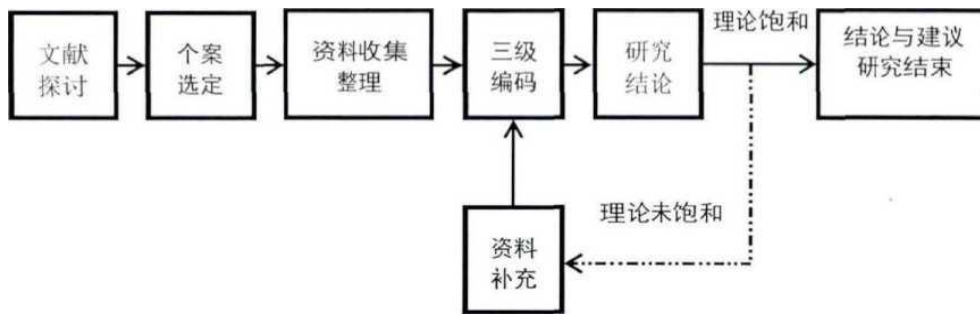


图1：扎根理论研究流程

研究假设及结果

创新的驱动力、创新障碍、创新资源投入三个因素与创新活动本身息息相关，蔺雷，吴贵生（2003）在《旅游演艺产品创新》一书中提到创新活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是旅游演艺产品创新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即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是否有效。本研究整合了上述因素，建立一个企业旅游演艺产品创新影响关系模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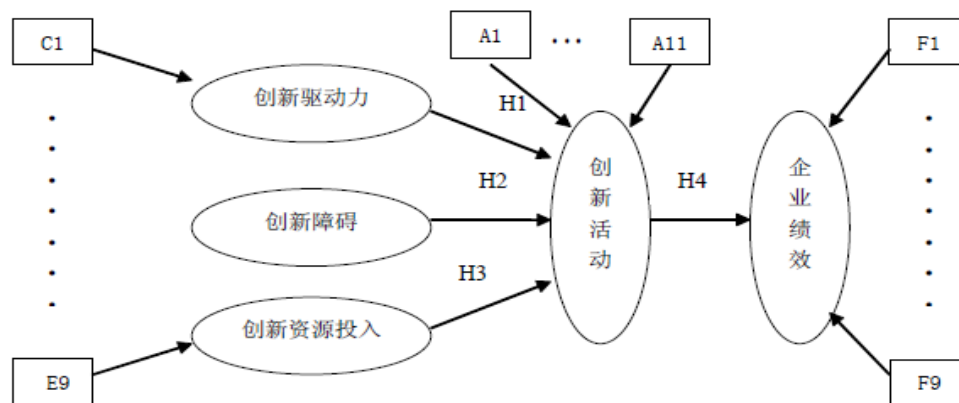


图2：企业创新活动影响关系模型

该关系图中企业创新活动与其三个影响因素路径关系中，创新驱动力的、创新障碍、创新资源为外生潜在变量，企业创新活动为内生潜在变量。

创新的驱动力不仅是影响旅游演艺企业进行创新的重要手段，还是旅游演艺企业制定旅游演艺产品创新战略的前提。无论是内部驱动力还是外部驱动力，都会对旅游演艺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但是影响程度的高低还要受到各方面环境的影响，所以旅游演艺企业应根据市场的不断变化以及自身的能力选择适合本企业的驱动力，从而保证创新活动的顺利实施。本文将创新驱动力的与创新活动间的关系 H1 表述为：



H1：创新驱动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正向影响。

旅游演艺企业必须认识到创新障碍对创新活动的重要影响程度，我们认为创新障碍的程度越高，企业创新活动成功的频率越低，因此，将创新障碍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 H2 表述为：

H2：创新障碍对企业创新活动有负向影响。

资源投入对技术创新的高产出具有直接原因，保障旅游演艺企业的创新活动顺利实施同样离不开资源投入的支撑。一般情况下，企业创新资源投入的强度越高，其创新活动也呈正向趋势。因此，本文将创新资源投入与创新活动间的关系假设 H3 表述为：

H3：创新资源投入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正向影响。

对旅游演艺产品创新的绩效评价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目的，不同的旅游演艺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有不同的目的，但最终的绩效是否与初始的目的的一致；二是创新运作情况，考察资源分配情况和企业管理层是否支持，组织学习的情况等；三是评价标准，包括财务绩效指标、机会指标、市场份额影响、竞争力的提升、企业整体利益等。本文将创新活动与创新绩效间的影响关系 H4 表述为：

H4：企业创新活动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案例收集与整理

本文选取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研究案例地，主要是基于旅游演艺资源及发展状况的考虑。该公司**是一家在政府支持和指导下成立的文化企业**，是省内唯一被文化部授予“**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演艺文化企业**，被评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单位、贵州省文化体制改革试点重点单位，公司位于贵阳大剧院，现有员工 260 余人。公司目前主要经营范围主要为文化项目的服务供应、文化产业项目投资运营，公司成功运作了一些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大型文化活动的，其优秀创意团队与执行力量在国内文化企业中有一定影响力。

访谈过程

本研究以**旅游演艺产品创新的维度**为主要内容，重点是分析评价**旅游演艺产品创新**的构成条件，指出产品现存的不足，并进一步分析**旅游演艺产品创新**的影响因素。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充分尊重受访者，获得了对方的信任与理解，并且在交互过程中与研究对象达到了情感上的共鸣，使受访对象对研究问题畅所欲言，使可供本研究参考的数据资料真实可靠。

构成要素的提出

为了对**旅游演艺产品**的构成要素进行研究，查阅了大量的中外文文献资料，同时请教旅游行业的专家学者，在语言和措词上反复推敲，在这一阶段共获得了 27 个要素。在初步得到**旅游演艺产品构成要素设计表**后，笔者将这些要素进行归类整理，把含义相近的要素进行合并，共计删除 4 个要素，剩余 23 个（见表 1）。

表1：构成要素设计表

编号	要素	编号	要素
1	市场定位	13	利润能力
2	差异化	14	品牌价值



编号	要素	编号	要素
3	产品创新	15	管理模式
4	基础设施	16	营销模式
5	价值主张	17	产品推介
6	产品内容	18	表演形式
7	演出场所	19	演出主题
8	产品价值	20	定价结构
9	关系网络	21	服务水平
10	产品构思	22	成本结构
11	经营宗旨	23	资本运作
12	收入模式		

预调研与量表的修正

在量表初步设计好后，先在小范围内进行预调研，主要调查对象为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员和旅游领域专家学者，共发放问卷 40 份，回收有效问卷 40 份，有效问卷率为 100%。样本的社会人口学特征（见表 2）

表2: 问卷量表

项目	类别	人数 (%)
性别	男	24 (60.00)
	女	16 (40.00)
学历	硕士及以上	10 (25.00)
	本科	16 (40.00)
	大专	7 (17.50)
	高中及以下	7 (17.50)
职位	高层经理	1 (2.50)
	中层经理	2 (5.00)
	基层经理	7 (17.50)
	普通职位	10 (25.00)
职称	教授	5 (12.50)
	副教授	5 (12.50)
	讲师	5 (12.50)
	助教	5 (12.50)



调研结果

在此次研究中拟通过平均值来考察此次构建出的各个构成要素对旅游演艺产品的重要性程度，认为平均值得分在 3 分以下的变量在构建的旅游演艺产品构成要素中不是很重要，要删除其对应的题项。最终，获得旅游演艺产品构成要素调查量表，如表 3 所示。

表3: 旅游演艺产品构成要素调查量表

编号	要素	平均值	标准差
1	市场定位	2.77	0.664
2	差异化	3.80	0.763
3	产品创新	4.23	0.671
4	基础设施	3.54	0.702
5	价值主张	3.31	0.538
6	产品内容	4.20	0.632
7	演出场所	3.99	0.618
8	产品价值	2.78	0.626
9	关系网络	3.71	0.527
10	产品构思	1.33	0.627
11	经营宗旨	4.29	0.604
12	收入模式	4.24	0.594
13	利润能力	2.85	0.355
14	品牌价值	3.42	1.448
15	管理模式	3.29	0.355
16	营销模式	3.88	0.492
17	产品推介	2.89	0.531
18	表演形式	3.67	0.240
19	演出主题	2.41	0.410
20	定价结构	2.19	0.125
21	服务水平	2.63	1.230
22	成本结构	3.78	0.452
23	资本运作	3.42	0.620

量表得到确认后，开始本次数据调研。本次调研是在 2021 年 5 月~6 月完成的。由于调研所涉及的内容比较专业，需要邀请到从事本行业中的人员，Nunnally 认为样本量至少是量表测量题项数目的 10 倍，本研究的量表中共包含 15 个测项，按上述标准，调查样本选择为 150 个。为了保证本次调研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调研时题项由笔者亲自询问，向被调研者解释题项所代表的内容，在充分的了解到其态度后再进行问卷的发放。本次调研实际上发放问卷 150 份，回收了 150 份，问卷 100%得到回收，经由人工检视，有 18 份问卷没有被填写完整，因此



将其视为无效问卷，共获取有效问卷 132 份，有回收率为 88%。选用 SPSS17.0、Amos17.0 软件，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本次问卷数据进行分析（见表 4）。

表4: 样本分布情况表

项目	类别	人数 (%)
性别	男	69 (52.27)
	女	63 (47.73)
年龄	30 岁以下	27 (20.45)
	30-40 岁	51 (38.64)
	40-50 岁	32 (24.24)
	50 岁以上	22 (16.67)
学历	硕士及以上	54 (40.91)
	本科	38 (28.79)
	大专	25 (18.94)
	高中以下	15 (11.36)
职业	企业管理者	10 (7.57)
	政府工作人员	41 (31.06)
	旅行社工作人员	37 (28.03)
	传承者	5 (3.79)
	民众	21 (15.91)
	学者	18 (13.64)

因子分析是一种数据简化和降维的分析方法，可以在尽可能多的保留原始数据的情况下用较少的维度去表示原先的数据信息。当量表的所有测量项目均拥有 0.4 以上的因子载荷时，就可以认为该量表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从问卷调查所得数据来看，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24 > 0.70$ ，与标准系数相符，量表的 KMO 值为 $0.796 > 0.70$ ，Bartlett 球形检验 Sig. (显著性) 为 $0.000 < 0.05$ ，达到显著，两项均通过检验，说明数据可以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因子分析，共萃取出 4 个因子，没有小于 1 的特征值，四个公因子共解释了总体方差的 62.685%

表5: 解释的总方差表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2.825	18.837	18.837	2.825	18.837	18.837	2.821	18.811	18.811
2	2.563	17.096	35.933	2.563	17.096	35.933	2.262	15.077	33.888
3	2.096	13.976	49.909	2.096	13.976	49.909	2.164	14.434	48.322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4	1.915	12.777	62.686	1.915	12.777	62.686	2.155	14.363	62.685
5	0.870	5.806	68.492						
6	0.744	4.966	73.458						
7	0.665	4.440	77.898						
8	0.616	4.116	82.014						
9	0.877	3.853	85.867						
10	0.538	3.595	89.462						
11	0.493	3.293	92.755						
12	0.391	2.614	95.369						
13	0.368	2.461	97.830						
14	0.262	1.756	99.586						
15	0.061	0.414	100.000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15 个变量归为 4 个因子，这 4 个因子的特征值都大于 1，分别为 2.862, 2.564, 2.097 和 1.916，没有特征值小于 1 的因子。

表6: 旋转成份矩阵表

要素	成分			
	1	2	3	4
演出场所	0.836			
表演形式	0.832			
基础设施	0.802			
管理模式	0.800			
经营宗旨		0.746		
营销模式		0.747		
关系网络		0.710		
资本运作		0.698		
价值主张			0.783	
产品创新			0.726	
产品内容			0.703	
差异化			0.689	
成本结构				0.906
收入模式				0.888
利润能力				0.695



研究结果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设计与数据获取。首先根据国内外成熟量表并结合扎根理论结果对本文涉及变量进行量表设计，并进一步制定研究调查问卷。之后通过小规模预测试，对获取的 40 份有效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with 信度、效度检验。又根据预测试结果对研究模型进行修正，调整量表及问卷内容并用于正式调研。最后针对本文正式调研的案例地、数据获取渠道、收集过程以及有效样本筛选标准进行阐述，并确定旅游演艺产品构成要素，并将影响创新活动的主要因素创新驱动、创新障碍、创新资源投入与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论述，以及创新活动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对每个变量的具体影响指标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模型，并将模型验证过程中所需要的分析方法作了简要的说明并得到最终结果，即 H1：创新驱动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正向影响。H2：创新障碍对企业创新活动有负向影响。H3：创新资源投入对企业创新活动有正向影响。H4：企业创新活动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

所以，旅游演艺企业必须认识到创新障碍对创新活动的重要影响程度，我们认为创新障碍的程度越高，企业创新活动成功的频率越低。资源投入对技术创新的高产出具有直接原因，保障旅游演艺企业的创新活动顺利实施同样离不开资源投入的支撑。

一般情况下，企业创新资源投入的强度越高，其创新活动也呈正向趋势。对旅游演艺产品创新的绩效评价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是目的，不同的旅游演艺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有不同的目的，但最终的绩效是否与初始的目的相一致；二是创新运作情况，考察资源分配情况和企业管理层是否支持，组织学习的情况等；三是评价标准，包括财务绩效指标、机会指标、市场份额影响、竞争力的提升、企业整体利益等。所以，企业创新活动对企业绩效有正向趋势。

讨论

本文对选题的时代背景、政策背景和学术背景进行了介绍，并对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展开了阐述，明确了构建了本文的整体内容框架，并阐述了支持论文进行的研究方法等内容。

对研究方法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理，这对实际工作中各类旅游演艺产品的市场化运作有很强的指导作用，同时也能给政府在该行业的行政和政策行为带来一些启发。对旅游演艺业的概念、发展概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对旅游演艺业的成长环境及旅游演艺产品创新维度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其演变过程和特点，并总结出了我国传统旅游演艺业态的特点和目前旅游演艺业态的发展创新和分类。以便对已有的研究结果进行一个明确的评述。

针对本研究的需求，对本研究选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并从信度与效度两个方面阐述了本研究选择的科学合理性。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以假设为基础的验证性研究，它是以大量的原始数据为基础，对其进行一步一步的解码分析，在解码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主观因素，而且，它还需要在反复的数据验证和补充中，不断地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最终得出的研究结论。



总结与建议

创新的驱动力无论是内部驱动力还是外部驱动力，都会对旅游演艺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影响，但是影响程度的高低还要受到各方面环境的影响，所以旅游演艺企业应根据市场的不断变化以及自身的能力选择适合本企业的驱动力，从而保证创新活动的顺利实施。

基于旅游演艺企业层面的建议：旅游演艺企业是推动旅游演艺产品发展升级的主要动力，旅游演艺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旅游演艺产品的创新：（1）**建立**长远目标，重视可持续发展。（2）**重视**企业与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的关系。（3）**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智慧旅游的概念越来越普及。对于旅游演艺企业而言，要积极应用网络技术促成旅游演艺产品的创新升级。

参考文献

- 叶志良. (2020). 中国旅游演艺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 *文化艺术研究*, 13(3), 7:10-16.
- 杨嵘, & 金妍. (2020). 旅游演艺的艺术表达与当代城市文化名片建设.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06), 75-79.
- 杨絮飞. (2020). 全域旅游视域下的东北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东北亚经济研究*, 4(6), 10.69-78.
- 张伟伟, 李琳, & 蒋玲玲. (2022). 红色文化活化方式对游客目的地选择的影响研究. *武汉商学院学报*, 36(4), 19-25.
- 赵春莲, & 柳红波. (2022). 文旅融合下沉浸式旅游演艺产品质量提升研究——以《又见敦煌》为例. *北方经贸*(9), 155-160.
- 姚延波, & 刘亦雪. (2019). 旅游市场秩序概念模型与运行机理: 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旅游学刊*, 34(5), 62-75.
- 徐凌, & 李忠华. (2022). 旅游演艺模式下海南红色旅游的发展路径探析. *边疆经济与文化*, (9), 6.:55-60.
- 蔺雷, & 吴贵生. (2003). *服务创新*. 清华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 Austin, A., Papciak, R., & Lovins, L. (2022). Gender euphoria: A grounded theory exploration of experiencing gender affirmation. *Psychology & Sexuality*, 13(5), 1406-1426.
- Ba, D., & Song, L. (2022). The Impact of After-Travel Sharing on Social Media on Tourism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rer: Analysis on Grounded Theory Based on Interview Data.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Mobile Computing*, 2022.
- Morehead-Gee, A., Dilara K.sküp, Omokaro, U., Shoptaw, S., Harawa, N. T., & Heilemann, M. S. V. (2022). Relating 'to her human side': a grounded theory analysis of cosmetologists' and aestheticians' relationships with clients in black american beauty salons to inform sexual health interventions.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1-18.
- Pabel, A., Naweed, A., Ferguson, S. A., & Reynolds, A. (2020). Crack a smile: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otional labour dysregulation in Australian reef tourism.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3(13), 1598-1612.

民间艺术传承发展路径探析——以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为例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FOLK ART-TAKE
THE JIANGKOU TUJIA “MONEY POLE” AS AN EXAMPLE**

李璇^{1*}, 王少文²
Xuan Li^{1*} and Shaowen Wang²

^{1,2}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研究生院

^{1,2}Chinese-Graduate School,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Thailand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397313276@qq.com

摘要

本论文旨在以江口土家族“金钱杆”表演艺术为例，探析民间艺术传承发展的路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传统民间艺术和文化遭受了严重的威胁和冲击。本文通过对“金钱杆”表演艺术历史和发展路径的探析，阐明其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相应的传承和发展路径和策略。本文首先介绍了“金钱杆”表演艺术的起源和特点，分析了现代化进程对其传承和发展的影响。然后，从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和市场推动等方面分析了“金钱杆”表演艺术传承和发展的路径和策略。最后，提出了一系列促进其传承和发展的具体建议和措施，包括加强政策保护、推动社会参与、完善市场机制、加强人才培养和开展文化交流等方面。通过对江口土家族“金钱杆”表演艺术的研究，本文旨在为推动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民间艺术 金钱杆 传承发展 路径探析

Abstract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art through the example of the Jiangkou Tujia's "money pole" performance ar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traditional folk art and culture have faced serious threats and challenges.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money pole" performance art,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t faces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corresponding paths and strategies for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ney pole" performance art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on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support,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market promotion, it analyzes the path and strategy of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money pole" performance art. Finally, a series of specific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promote i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policy protection, promoting social participation, improving market mechanisms, strengthening talent training, and conducting cultural exchanges.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Jiangkou Tujia's "money pole" performance ar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art, as well as promoting social harmony and cultural diversity.

Keywords: Folk art, money pol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Path exploration



引言

1.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传统的民间艺术和文化遭受了严重的威胁和冲击。然而，民间艺术不仅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因此，对于保护和传承民间艺术，以及促进其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组织形式，具有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是土家族人民的一种文化瑰宝。然而，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贵州省城镇化进程加速，“金钱杆”表演艺术氛围浓郁的农村人去楼空，“金钱杆”表演艺术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因此，深入研究“金钱杆”表演艺术的历史和发展路径，探索其传承和发展的途径和策略，对于推动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论文旨在通过对江口土家族“金钱杆”表演艺术的历史和发展路径的探析，阐明其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分析其传承和发展的路径和策略，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措施，以促进金钱杆表演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推动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2. 研究意义

本文重点阐述探究民间艺术传承发展路径的重要性和研究的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传承文化遗产。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体现形式。深入探究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路径，有助于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

2.2 促进文化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需要与时俱进，融合现代元素，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通过研究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路径，可以促进文化创新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2.3 推动地方文化经济发展。民间艺术是地方文化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广泛的市场需求和经济价值。通过研究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路径，可以促进地方文化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2.4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民间艺术是民众的文化表达形式，是民众文化自信和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研究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路径，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

综上所述，探究民间艺术传承发展路径的重要性和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传承文化遗产、促进文化创新、推动地方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更关键的是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高人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对于建设一个和谐、文明、富强的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目的

本论文旨在以江口土家族“金钱杆”表演艺术为例，探析民间艺术传承发展的路径。通过对“金钱杆”表演艺术历史和发展路径的探析，阐明其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相应的传承和发展路径和策略。为推动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提供参考。



文献综述

1. 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是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相关的文献很多，在中国知网以“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有相关文献499篇。其中与“传承与发展”相关的有251篇，与“民间艺术”相关的有110篇，与“民间剪纸艺术”相关的有39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有14篇，与“民族民间艺术”相关的有18篇，具体简要综述如下：

“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探析”（郑雪霞，2021）：该文首先对民间艺术的含义和分类情况进行简要论述，其次全面客观地揭示传统民间艺术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实际案例探讨了民间艺术的传承现状和存在问题，最后就如何促进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提出一系列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和建议。

“传统民艺传承和发展的出路探讨”（曾世巧，2021）：该文通过从传统民艺传承和发展的现状入手，以平度市面塑和泥塑为例，对比刘伟、高杰和荆宝海在民艺传承和发展上的差异以及三者对民艺传承和发展上的优点。从民艺学的角度研究分析，为传统民艺的传承和发展提出建议。

“群众文化活动促进民间艺术传承主要对传与发展”（彭涛，2021）：该文承和发展民间艺术的重要价值，以及群众文化活动在促进民间艺术传承和发展方面的作用进行分析，探讨利用群众文化活动促进民间艺术传承和发展的具体策略。

“浅谈如何以世界视野传承和发展传统民族民间艺术”（许易颖，2019）：该文通过对民族民间艺术现状的分析，对民间艺术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进行了探讨，认为行政干预和媒体传播是影响传统民族民间艺术传承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强调时代在变化，人们应当站在世界的视野，重新审视这种艺术，思考如何传承和发展传统民族民间艺术。同时分析了民间艺术在市场竞争和文化认同方面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李亚飞，2018）：该文强调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传统文化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慢慢的丢失了属于中华民族祖先的智慧与本土的骄傲，中国传统民间艺术文化精髓的传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人们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更需要注重民族的，民间的文化，并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天依然发挥它独有的魅力，人们仍旧可以从它身上汲取养分。并提出了保护和传承民间艺术的措施和建议，如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提高民间艺术家的地位和待遇等。

“从人文主义角度看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与发展”（辛琳琳，2017）：该文基于人文主义的视角，探索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新路径，维持和促进民间艺术大发展、大繁荣局面成为当今文化艺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人文主义对于少数民族艺术的研究，在根本上讲，是对于人类原始需求的探索，具有集中社会文化中精神之美的特点。通过人文主义去解释和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歌舞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来达到在根本上促进民族文化繁盛的意图。

综上所述，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对民间艺术的定义、特征、传承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此外，一些文献也关注了民间艺术的市场化发展和文化认同方面的问题。

2. 江口土家族和“金钱杆”的相关研究

关于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相关研究甚少。在中国知网以“金钱杆”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有相关文献29篇，以“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为主题进行检索只有3篇。关于江口土家族和“金钱杆”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



贵州师范大学杨娜英的硕士学位论文《城镇化进程中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传承与发展研究》(2021), 该文选择了村落变化较大的土家族传统村寨云舍村以及闵家场村为个案研究, 利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实地考察法等研究方法归纳和整理了金钱杆的起源、活动特点、发展历程、文化流变及开展现状等, 并分析了金钱杆的发展历程。

“文化功能视角下江口“金钱杆”的发展逻辑研究”(陈伟, 2021): 该文主要探求“金钱杆”发展逻辑, 旨在为“金钱杆”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有益的指导。

“黔东北民族打击乐器“金钱杆”多渠道发展策略研究”(韦琴芬, 2016): 该文通过分析黔东北民族打击乐器“金钱杆”目前在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从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角度出发, 提出“金钱杆”多渠道发展的策略, 旨在通过研究民族打击乐器在新时代的发展策略来促进民族打击乐器的多元化发展, 让“金钱杆”成为地方民俗文化发展的带动力。同时从结合美、诙谐美、朴实美三个方面对“打金钱杆”的审美特征进行论述, 指出保持“打金钱杆”的审美特征是“打金钱杆”发展的基本前提, 旨在为进一步推动“打金钱杆”的良好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觉。

“土家族“金钱杆”引入高职体育课程的探讨”(吴慧倩, 2009): 该文通过对黔东北土家族传统体育项目“金钱杆”的社会特性和功能价值的研究, 提出将黔东北土家族“金钱杆”引入高职体育课程开发的构想。将其引入高职体育课程之中, 可以丰富学校体育教学资源, 节省教学设施的投入; 对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促进学校体育教学改革与发展, 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 已有的关于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文化内涵、发展逻辑、制作工艺、传承现状和表演艺术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和传承建议。虽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 但是还需要深入探究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传承和发展路径, 探索其在当今社会中的创新和发展方向。

研究方法

1. 研究方法的选择

对于探究民间艺术传承发展路径的研究, 本文主要综合运用调查、访谈、观察、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 具体如下:

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 了解公众对江口土家族“金钱杆”和其他民间艺术的认知程度、兴趣度以及传承和发展的态度和看法等, 从而得到相关数据, 为研究提供参考。

访谈研究: 通过与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传承人、制作者、收藏家等进行深入交流, 了解他们的传承经验、技艺掌握情况、制作过程、收藏收购标准等信息, 从而得到相关经验和见解, 为研究提供实质性的支持和数据。

观察研究: 通过实地观察和记录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传承现状和制作过程等情况, 探索其传承和发展的现状和特点, 为研究提供直观的数据和信息。

文献分析: 通过收集和阅读相关的历史文献、专业论文、图书、报刊杂志等资料, 系统地梳理和分析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传承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内涵、技艺特点、传承现状、保护策略等方面的内容, 为研究提供深入的理论支持和参考。

综上所述, 通过综合运用以上不同的研究方法, 可以全面深入地探究江口土家族“金钱杆”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路径, 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有力的支持和数据。

2. 数据来源和采集方法

针对研究“民间艺术传承发展路径探析——以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为例”实际需要，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和采集方法，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实地观察、文献梳理等方法，具体如下：

问卷调查：可以通过向社会大众、艺术爱好者、传承人、制作者、收藏家等不同群体发放问卷来了解他们对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对于民间艺术传承和发展的看法和建议等。

深度访谈：可以选择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传承人、制作者、收藏家等相关人士进行深入访谈，了解他们对于该艺术品的制作技艺、文化内涵、传承经验、收藏标准等方面的经验和见解。

实地观察：可以到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制作地和传承地实地观察，记录制作过程、收藏情况、传承现状等信息，以全面深入地掌握民间艺术传承发展的实际情况。

文献梳理：可以收集、整理和梳理相关的历史文献、专业论文、图书、报刊杂志等资料，从中了解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历史渊源、技艺特点、文化内涵、传承现状等方面的信息。

以上是可能的数据来源和采集方法，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具体选择和组合不同的方法。同时，在数据采集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和相关权益，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研究结果

本文将通过分析江口土家族“金钱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和特点，探究其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

1. 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传承历程

江口土家族“金钱杆”是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品，其传承历程可以追溯到明代。本文将从古至今对“金钱杆”的起源、发展、演变和创新进行阐述，具体传承过程如下。

1.1 起源：据传，“金钱杆”最初起源于明代的官营钱局，是官方用于铸造货币的一种工具，用于铸造铜钱。因其形状类似于现代的铁锤，故得名“金钱锤”或“铜钱锤”。后来，民间艺人将其发展成为一种装饰艺术品，用于展示财富和地位，并且逐渐成为一种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品。

1.2 发展：在清代，随着手工艺术的发展，江口土家族开始将“金钱杆”用于传统婚礼、寿宴等场合的表演和礼仪活动中，以展示家族的财富和地位。此外，也有不少艺人开始将“金钱杆”制作成为摆设品，用于装饰家居或商店。

1.3 演变：在近现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形式和用途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现代的“金钱杆”不再只是单一的装饰品，而是将钱币、饰品、珠宝等元素融合在一起，以展示个人的品位和审美趣味。此外，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金钱杆”也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旅游纪念品。

1.4 创新：在传承过程中，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也不断进行创新。例如，在制作工艺上，现代的“金钱杆”开始采用机器制作，并且使用更多的贵金属和珠宝来装饰，提高了制作的效率和质量。此外，在艺术表现上，一些艺人也开始将现代元素和传统元素相结合，以适应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总之，江口土家族“金钱杆”在传承过程中经历了起源、发展、演变和创新的历程，不断适应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的需求，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特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民间艺术品。

2. 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发展历程

本文将对江口土家族“金钱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和特点进行分析，探究其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2.1 起源和初期发展阶段（明代至清朝中期）

据考证，江口土家族“金钱杆”起源于明代，具有悠久的历史。最初的“金钱杆”是由一些有钱有闲的土豪地主聚集起来，通过演奏音乐和表演技巧来娱乐自己和村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这一艺术形式，并且开始在村庄、集市等地方演出。这一时期，“金钱杆”还没有固定的演出形式和规则，每个演员都自由发挥。

2.2 规范化和发展阶段（清朝中期至民国初年）

清朝中期，“金钱杆”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正式的艺术形式，并制定了演出规则和标准化的演出流程。演出时通常由数人组成，分为主奏、伴奏和歌唱三部分。同时，“金钱杆”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成为江口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金钱杆”还存在一些不足，如演奏技巧、表演形式等需要改进。

2.3 历经战争和困难阶段（民国至新中国成立）

20世纪初，中国开始进入动荡不安的战乱时期，“金钱杆”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战争和动荡的环境对其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很多传统文化和艺术形式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这一时期，“金钱杆”逐渐减少了演出次数和演员数量。但即便如此，“金钱杆”在江口土家族的民间文化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2.4 繁荣发展和创新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

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文化艺术的扶持和鼓励，使得江口土家族“金钱杆”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金钱杆”表演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金钱杆”表演团体和演员，推动了这一艺术形式的创新和发展。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增加，江口土家族“金钱杆”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首先，江口土家族“金钱杆”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和支持，许多政策和措施被采取来促进其传承和发展。例如，政府设立了一些培训班和工作坊，为传承人提供技能培训和市场营销方面的指导，帮助他们提高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此外，政府还出台了一些税收减免和奖励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和支持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发展。

其次，江口土家族“金钱杆”得到了更广泛的宣传和推广。在新闻媒体、文化节庆、旅游景点等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到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身影，使其受到更多人的认识和喜爱。例如，每年的江口土家山歌节和土家族花灯节等文化活动都会展示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等传统手工艺品，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参观者。

最后，江口土家族“金钱杆”在技艺和创新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传承人们不断探索和实践，将传统的手工艺技术与现代设计和生产方式相结合，推出了一些新的款式和产品，逐渐走向了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道路。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后，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经历了繁荣发展和创新阶段，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广泛的宣传推广以及技艺和创新的提升都为其传承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讨论

1. 影响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传承和发展的因素和机制

1.1 传承因素

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其传承和发展受到多个方面的因素影响。本文将从人文环境、社会经济、政策法规等多个方面分析影响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传承的因素。

首先，人文环境是传承的重要因素。江口土家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在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人们对“金钱杆”等民间艺术形式有着深厚的情感和认同，这为其传承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其次，社会经济因素也对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早期，由于贫困和交通不便等原因，土家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往往只能在局部范围内流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化，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得到了提升，这为“金钱杆”等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此外，政策法规也是影响传承的重要因素。外部环境方面，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市场需求、文化交流等也对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对传承人提供技能培训、市场营销指导、税收减免和奖励等政策，为江口土家族“金钱杆”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市场需求的变化也推动了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发展，例如近年来对手工艺品的需求增加，使江口土家族“金钱杆”得以更好地拓展市场。文化交流方面，江口土家族“金钱杆”得到了更广泛的宣传和推广，加强了其与其他地区手工艺品的交流和学习，推动了其技艺和创新的进一步提升。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加大了对民间艺术的保护和扶持力度，鼓励和支持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例如，江口县政府出台了多项保护民间艺术的政策，为“金钱杆”等传统艺术形式的传承提供了有力保障。

综上所述，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传承的因素涵盖了人文环境、社会经济、政策法规等多个方面，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着“金钱杆”等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1.2 发展机制

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传承和发展固有其内在的机制，传承人们的自我意识和创新能力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不断探索和实践，不断完善技艺和工艺流程，推出新的产品和款式，使传统的手工艺得以传承和发扬。此外，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传承人们之间的交流和学习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们相互学习、交流技艺，共同推动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传承和发展。其离不开技艺传承、市场需求、政策支持等方面的机制，具体阐述如下。

技艺传承机制：技艺传承是保障“金钱杆”传承发展的基础。传统技艺往往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但随着社会发展和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传承方式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一些传承人开始采用现代化手段，如互联网和移动应用程序等，将技艺传承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

市场需求机制：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提高，人们对于文化艺术产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市场上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和受众。因此，市场需求的机制也成为了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政策支持机制：政策对于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如民间文艺扶持政策、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等，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支持。

除此之外，传承人自身的意识和行为也是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坚持，以及对现代市场需求的敏锐把握和创新意识，对于“金钱杆”传承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发展是受到其内在机制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影响的。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创新能力和与外部环境的协调，才能更好地实现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传承和发展。

总结与建议

1. 未来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传承和发展的展望

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作为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形式，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展这一传统文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保护和支持。

1.1 建立保护机制。要从法律层面加强保护，制定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依法保障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传承和发展。此外，还可以建立相关的组织和机构，对江口土家族“金钱杆”进行保护和维护。

1.2 加强市场推广。市场推广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需要加强对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推广和宣传，扩大其知名度和影响力。可以通过建立网上商城、开展旅游商品销售等多种方式，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1.3 加强政策支持。政策支持是推动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保障。需要加大对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等传统文化的扶持和支持力度，如加大政策倾斜幅度、增加项目资金、提供技术支持等。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推动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等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1.4 强化艺术再造。江口土家族金钱杆是一种传统的手工编织艺术，常见于中国贵州省的江口土家族聚居区域。这种工艺品主要通过舞蹈的艺术形式得以闻名于世。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下，江口土家族金钱杆面临着失传的风险。为了保护和传承这种传统文化，许多当地机构和民间艺术家开始探索使用现代技术和工具以及新的表演形式来重新推广这种特有的艺术品和表演艺术。其中一个成功的案例是“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将江口土家族金钱杆表演列入校本课程及课间操、广播操”。并希望培养未来的山区教师将金钱杆表演艺术薪火相传。通过这种方式，不仅使得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表演艺术得以规范，还有助于将这种传统文化带给更多的人。此外，当地还通过大型的展览活动，如旅发大会等大型活动来促进人们对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认识和理解，为其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有益的支持。

加强保护机制、市场推广和政策支持以及艺术再造是推动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传承和发展的有效途径，并且也有助于促进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推动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的发扬。

2. 结论

本文研究了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传承和发展的影响因素、机制以及未来展望。研究表明，影响“金钱杆”传承和发展的因素包括人文环境、社会经济、政策法规等多个方面；“金钱杆”传承发展的机制主要包括技艺传承机制、市场需求机制和政策支持机制；未来需要建立保护机制、加强市场推广和加强政策支持，以推动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本研究的贡献和创新点在于深入探究了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传承和发展的因素和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和未来发展的建议。通过研究，我们了解了江口土家族“金钱杆”传承发展的整体情况，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未来研究方向建议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应深入挖掘江口土家族“金钱杆”历史和文化内涵，以便更好地拓展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推广；其次，要探究传统文化和现代技术的结合，探索数字化传承和智能化开发，“金钱杆”等传统文化形式的推广和传承；最后，需要加强合作和交流，推动地方文化产业的整合和发展，为更多的传统文化形式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参考文献

- 韦琴芬.(2016).黔东北民族打击乐器“金钱杆”多渠道发展策略研究. *北方音乐*, (02):6-8.
- 许易颖.(2019).浅谈如何以世界视野传承和发展传统民族民间艺术. *牡丹*, (23):17-19.
- 李亚飞.(2018).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西部皮革*, (17):73-75.
- 杨娜英.(2021). *城镇化进程中江口土家族金钱杆的传承与发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贵州师范大学).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name=CMFD202201&filename=1021716359.nh>
- 辛琳琳.(2017).从人文主义角度看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传承与发展. *贵州民族研究*, (01):136-140.
doi:10.13965/j.cnki.gzmzyj.10026959.2017.01.030.
- 陈伟.(2021).文化功能视角下江口“金钱杆”的发展逻辑研究. *中华武术*, (01):119-121.
- 郑雪霞.(2021).传统民间艺术的传承和发展探析. *大观(论坛)*, (05):21-22.
- 彭涛.(2021).群众文化活动促进民间艺术传承与发展. *牡丹*, (04):187-188.
- 曾世巧.(2021).传统民艺传承和发展的出路探讨. *西部皮革*, (05):146-148.

黔东民间舞蹈思南花灯的传承与发展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OLK DANCE SINAN LANTERN IN EASTERN GUIZHOU

谢静雯^{1*}, 甄巍², 杨先琳³

Jingwen Xie^{1*}, Wei Zhen², and Xianlin Yang³

^{1,2}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研究生院

³ 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艺术与体育教育学院

^{1,2} Chinese Graduate School, Panyapiwat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Thailand

³ School of Art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ongren Preschool Teachers College,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7757792264@qq.com

摘要

贵州偏远小县城“思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其中闻名遐迩的“思南花灯”艺术就萌生于此。“思南花灯”是一门古老的歌舞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以优美的唱腔、浓郁的乡土味、特有的民族风情和思南土家傩戏、摆手舞以及地方民歌的一些元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色。它既是黔东地区思想文化，生活习俗、生产活动，民间艺术的综合性展现，更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记忆载体与活性文化基因组成，具有浓厚人文气息和独特的艺术魅力。2006年，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思南花灯，列入其中。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口述历史法、问卷调查法、文本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贵州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思南花灯”的传承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贵州“思南花灯”传承发展演变的回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贵州“思南花灯”传承发展的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并提出了相应的现实对策。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思南花灯的表演形式、歌词、非遗传继承等，从而拓展了思南花灯的文化结构和多元价值观的探索，并结合思南花灯的发展现状思考了思南花灯的继承和发展路径。本文重点论述了思南花灯的艺术特色，分别从题材内容、角色塑造、舞美设计、舞蹈语言四方面展开讨论，通过实地考察发现：思南花灯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它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深厚群众基础；同时也面临着后继乏人、经费不足、人才断层等诸多困境。因此，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一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二是加强组织领导，落实保护措施；三是注重培养接班人，做好传帮带工作；四是拓宽筹资渠道，增加资金投入；五是建立健全机制体制，确保有效传承；六是积极参与各类展演活动，扩大影响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光大。本文不仅从适应现代化的角度研究和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有序传承问题，而且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和方法参考。

关键词: 思南花灯 传承发展 文化研究

Abstract

"Sinan", a remote county in Guizhou Province, is rich i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mong which the famous "Sinan Flower Lantern" art originated here. Sinan Flower Lantern is an ancient dance art with a long history. It has formed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with beautiful singing, strong local flavor, unique ethnic customs, Sinan Tujia Nuo Opera, hand dance and some elements of



local folk songs. It is not only a comprehensive display of the ideology and culture, living customs,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folk art in East Guizhou, but also a carri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memory and active cultural gene, with strong humanistic flavor and unique artistic charm. In 2006, Sinan Huadeng, the first batch of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in China, was included in the list.

This paper mainly uses literature, field investigation, oral history, questionnaire, text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carry out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Guizhou "Sinan Flower Lantern",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the review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Sinan Huadang", on this basis, the problems affecting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Guizhou "Sinan Huadang" and the crux of the problem and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ractical countermeasures. On this basis, it explores the performance forms, song words and non-genetic successors of Sinan Huadeng, etc., thus extending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ultural structure and multiple values of Sinan Huadeng, and then thinking about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Sinan Huadeng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Sinan Huadeng.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inan Flower Lantern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targeted and constructiv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his paper not only trie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problems of scientific protection and orderly inheritanc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apting modernization, but also provides certain ideas and methods reference for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products.

Keywords: Sinan Lanter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Cultural Research

引言

花灯，起源于唐代民间传统灯会，后盛行于明清时期并发展成为花灯歌舞形式，至今演变为流行于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的地方传统戏曲形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思南花灯受本土文化、风俗、方言、戏曲等因素的影响，逐渐演变成独特唱腔和独特表演风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黔东艺术大花园中瑰丽的一朵奇葩。本文选题研究内容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

挖掘花灯资源，抢救民间艺术遗产

当今时代，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加上人们思维观念的改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传统的民俗被越来越多的新兴文化类型所吸收，丧失了原有的形式，并被忽略。大部分人看不到民间艺术的可贵之处，不愿学不愿看，都喜欢快速发展的流行文化，青年一代的思南花灯继承者又学艺不精。因此，民族文化和传统艺术的沿袭都面临危机。“花灯”是一门集歌唱、表演与舞蹈一体的艺术，而传统的表演方式只是通过口传心授的形式传承下去，然而存世的老艺人越来越少，一些都已经步入老年或者离世，这种古老的民俗文化已经面临失传，因此必须全面挖掘、记录、整理和发展这些传统文化，并以文字、记录、摄影等各种方式保存，以搜集到最原始的、最直接的信息，使其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也是本课题的主要原因。

丰富思南花灯文字纪录素材，呼吁社会对花灯艺术的重视

此外，对思南花灯也进行了大量的数据调查。当地花灯艺术传承人、专家学者都曾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调研、整理、记录等工作中，尚有一些欠缺。本文选题以广扬传统文化为目标，从“花灯传承人”、“花灯曲目”“花灯发展现状”、“花灯保护研究和传承”等几个角度来论述。为大家展现思南花灯的独特艺术风貌，加深人们对其文化的认识，并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号召相关部门、社会团体重视其发展与传承。

展现花灯艺术魅力，推广民俗文化

“灯从唐朝起、戏自明代兴”古老的花灯戏历经时代变迁，距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光彩却并未黯淡，至今仍在黔东大地华丽绽放。因此我们不仅要宣扬思南花灯的艺术魅力，更要让无数喜爱传统文化艺术的人了解学习思南花灯并加以传承和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了解思南花灯独特的艺术魅力和艺术价值，更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剖析，并让人们将其弘扬、传承、发扬光大。

内容

2005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見》，这是国家层面为抢救各民族传统文化而正式采取的第一个积极有效的举措，即“将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在 100 多个国家开展，但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它的意义应该是不同的。中国全国人民以饱满的热情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推动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实现我国民族文化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中国著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高秉中指出：中国适时加入《公约》，积极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引发了一场文化运动。这不仅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新主流接轨，也为中国公共文化理顺关系、与本国社会互动提供了机会，从而使中国文化成为一种新面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不仅是文化保护的社会活动，也是实施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基于上述社会背景，特别是 2005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見》后，国内学术界正式拉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序幕。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已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撰写了不少学术著作，主要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价值和发展等方面。例如，宛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十项基本原则》，刘奎立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万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十项基本原则》等，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思想、基本原则和保护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娜仁图雅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研究》，李冰雪的《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职业教育路径研究》，王美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的定义、分类及价值追求》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原则、开发与利用、开发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目前，贵州思南民间“歌”“舞”的传承和发展情况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学术资源的基础上，作者已经收集到近百种有关的文献。与贵州民俗舞蹈有关的文献有 10 本左右，期刊 10 多份，5 份硕士论文。根据文献记载，思南花灯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学术期刊上，也有少量的专著。这些学术论文大多是从思南花灯的历史、形态、内容、艺术特征等角度来探讨和研究的，很少有人对思南花灯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探究，下面仅列出部分与思南花灯“歌舞”相关的研究：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的《思南花灯史话》中，对“思南花灯”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的挖掘、整理，当属最有价值的研究。主要内容是从思南花灯的形成、发展、艺术形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以“印江”、“德江”、“沿河”、“石阡”四大区域为主来论述其特点。

《思南土家花灯论文集》是思南土家花灯的编委会主编（贵阳远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2004 十月），这一丛书的主题是：崔德虎《黔东土家民俗文化遗产考察——以黔东土家曲艺为中心》，祝修明《贵州思南土家花灯音乐的艺术特征研究》，田永红《谈傩戏与花灯的异同关



系》，邓光华《思南花灯研究三问》，吴太祥《思南花灯剧种的形成及其特征的试析》，贺力高的《黔东北土家花灯艺术探微》等 18 个专题。

崔德虎（2014）《黔东土家民俗文化遗存考察——以黔东土家曲艺为中心》，以黔东土家族民俗文化为研究对象，从土家的类型、特点、传承与保护等角度出发，重点研究了贵州土家族乡的民间音乐。他提出，在继承与保存民间文学的过程中，必须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保持原有的特点，进行革新，使传统的“原生态”的民风文化过渡到“次生态”，进而激活民间文学的生命力，使其更好地弘扬和发展。

祝修明（2009）《贵州思南土家花灯音乐的艺术特征研究》，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他把思南土家的“灯火调音”看作是思南土家人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经过反复的提炼和加工而产生的一种独特的音符。它在思南花灯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同时也是土家族乐风、乡土风情的一个主要元素。

田永红（2007）《谈傩戏与花灯的异同关系》，着重探讨了土家和傩舞在艺术表达方式上的相似性和差异。本文认为，傩舞与灯会是同根同源的，其传承与艺术表达方式具有诸多共性与异质性，又彼此融合，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可供作者在大量的史料中借鉴。

韦舒馨 王鸿昀（2017）《天津地区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研究》一书，以“漕运文化”、“民间信仰”和“民俗活动”为切入点，阐述了天津民间歌舞的起源；本文以新中国建国为切入点，对天津民族舞蹈发展的历史和发展进行了简要的阐述，并从目前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等方面阐述了天津民族舞蹈发展的状况；第三，提出了具有远见的意见。本文对舞美的本体论进行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提出的发展方案主要侧重于对传统的文化遗产与美术教学，而未触及与当前的社会需求相融合的问题。

林友（2018）《苏州地区民间舞保护现状调查研究》，以苏州民间舞蹈的类型、苏州民间舞蹈调查成果、苏州民间舞蹈的保护措施等为切入点，《对策》为笔者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王子毓（2019）《口述史语境下山东淄博地区非遗舞蹈“踩寸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山东淄博民间非遗舞蹈“踏寸子”的传承与发展》，虽然与本文的主题有所区别，但其视角却与本文相近，其内容涵盖了“踩寸子”的历史渊源、生存环境、艺术特征、传承现状、传承意义、存在问题和对策等问题。

王依斌（2020）以《长穗花鼓传承与传播》为案例，从四个角度阐述了在“非遗学观念下民间歌舞的发展”这一主题，阐述了在“非遗学视角下，如何继承和发扬长穗花鼓，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作者可以从天津各地的不同民俗文化和传统民俗文化的联系和共同特点出发，总结出一些新的视角和发展途径。

高飞和屈丽蕊（2014）《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天津回族重刀武术的保护与发展研究》，着重对天津回族的重刀功夫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发展策略和对策等进行了阐述。在发展战略和对策方面，笔者提出了将回族的重刀拳与电视媒体、民间节庆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这种方法可以拓展作者的思维，并将其应用到文章中。

郭静（2017）《民间舞蹈产业化发展研究》一书，就新时代民间舞如何突破工业化发展的路径，从其自身的视角出发，对今后发展的需要进行了探讨。

高琪强（2018）《论旅游开发对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影响——以张家界家族舞蹈为例》《论旅游开发对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影响——以张家界家族舞蹈为例》舞蹈发展现状，舞蹈种类，张家界土家族舞蹈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作用，并对其产生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应



的对策建议。本文所述的正负效应可以参考，并根据天津民俗舞蹈发展的困境与现实情况，在应对对策时将有关论证加以支持。

阎晓箐（2019）《地域文化背景下民间舞蹈艺术传承发展策略》认为，要实现民族舞蹈的传承与发展，必须通过构建与健全文化营销系统、继承传统民俗舞蹈、发掘民间舞的潜能，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根据以上现有的研究结果对“思南花灯”的传承和发展中所存在的难题，提出相应的实践对策和建议。为笔者研究思南花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发等方面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和参考价值。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商业化和旅游业的发展，许多国家的传统文化逐渐衰落。自 21 世纪初以来，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逐渐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扩大到全世界，以有效保护世界人民的传统文化，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作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全球文化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无疑处于最前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一倡议是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在全球化和现代化步伐加快的情况下，保持文化多样性和文化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是各国政府保护本国文化传统和表达自身愿望体现。

传承与发展的的问题，已成为了各国学者共同关注和侧重研究的全球性议题。目前国外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对于构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地方性知识”，以及生成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中国经验”，具有较为重要的借鉴意义。尽管国外学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起步较早，尤其是在日本、韩国、英国、美国等世界发达国家已有 200 多年历史，不仅在实践探索上积累了丰富的保护经验，而且在理论研究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但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具体国情不同，国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没有进行分门别类，也就是没有专门针对思南花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不过，国外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对本论文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譬如，韩国人类学家金光亿（2009）在其论文《艺术与政治：20 世纪 80 年代的韩国民族艺术运动》中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新解放的韩国没有重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它正在巩固国家和发展经济，并受到西方中心主义世界潮流的影响，直到那时，人们才意识到艺术是韩国知识分子开始挖掘的民间传统艺术，并深入农村寻找音乐、艺术。日本千叶大学宫崎清教授与张福昌（1999）在《日本传统手工艺与保护与振兴》中指出，在农民生活中，这种对传统艺术的重视已经从知识分子传播到了普通大众，从而使人们意识到民间传统艺术的价值。日本将保护传统手工艺纳入法律，制定了《文化财富保护法》，将保护文化财产分为四类，分为有形文化财产、无形文化财产、民间材料和纪念物。另外 Nettleford（2004）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迁移、传承和维持保护》重点关注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迁移现象，以分析迁移导致的遗产流失、衰落和促进遗产传承和创新的现象，以回应这些担忧、Van Zanten（2004）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新术语》呼吁实施《RUO 公约》，一些必要的操作概念需要修改和定义，例如从人权角度定义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的概念，法律规定的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的权力是谁的问题，在一系列操作过程的背景下，例如确定无形和有形之间的密切关系，迫切需要新的术语、Kurin（2004）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样性与一致性》回顾了影响非物质文化文化遗产保护标准的几个因素，并审视了非物质文化传承概念的演化。除此之外，Ahmad（2006）的《我的有形与无形遗产保护历程》、Keitumetse（2006）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非洲遗产管理方法的实用含义》、Morsi（2005）的《关于非物质遗产研究与保护方案》等从不同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进行了有深度的研究。总的来说，国外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可以说取得了比较丰富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



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案例。遗憾的是国外还没有人对贵州的“思南花灯”进行过深入、全面的研究。但已有不少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无论是在方法论，研究视角，还是理论阐释上对本论文的研究具有较为重要借鉴意义。

研究对象背景概述

思南县位于铜仁市西部，地处武陵山腹地，乌江流域中心地带。全县地域面积 2230.5 平方公里，17 个镇，3 个街道办事处，有汉、土家、苗、侗等 18 个民族，总人口约 70 万。思南历史源远流长，汉置永宁县，元设宣慰司，明清为思南府，距今已有 1700 多年的历史。因得乌江航运之便，自古商贾云集、经贸繁荣，属贵州开发最早的县份之一，是乌江中下游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素有“黔中首郡·乌江明珠”之美誉。思南文化底蕴深厚，先后走出了“贵州科举之父”田秋、明朝理学家李渭、红军高级将领旷继勋等著名人物。思南土家花灯文化传承一千多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思南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从观思南的史料可以看出，这里的历史非常久远，早期的时候，这里是水路和食盐的贸易中心，经常有其他的盐商从这里经过，所以这里的生意越来越好，乌江的盐号，在思南还保留着。在中国新的历史阶段，一二三工业的发展是与之相适应的，二十一个世纪以后，主要集中在第二三工业，尤其是最近几年，在思南县石林景区、腾龙峡、白鹭湖等第三行业都比较活跃，尤其是最近几年，旅游业发展迅猛。服务业领域，盐市街商圈、思丰商城商圈等都是近几年的发展目标。21 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

“过大年”是思南地区最盛大的民间节日。乡间有“杀年猪”的风俗，到了十二月中，各家都会宰一头大年猪，并请长辈、寨邻吃“刨汤”家家户户制作腊香肠，烤火炕。大年三十，每家每户都要准备年货，酿造甜酒、制作花甜粑、蒸粉蒸肉、烙绿豆粉等等。思南人信奉佛教，在除夕夜的时候，他们会烧香烧纸，祭拜祖先，燃放鞭炮。三十的晚上吃完年夜饭后，一大家子围着一堆篝火，整晚都在“守岁”，并在天亮之前，“开财门”，这场盛大的新春节日会持续到正月十五。过去，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到沙洲村去吃灯节，这是对过年的告别。在乌江，每年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赛船比赛，除传统节日外还要挂艾蒿，吃粽子。还有一些民俗活动，比如月半节，中秋，重阳节等。这里的人信仰的是玉皇大帝，王母，观音菩萨，秦叔宝，尉迟恭，等等。思南人勤劳朴实，待人热情，自立自强是他们的优秀品质。

通过多次实地考察，我们在原有的问题中找到新的问题，并不断地解决问题，不断地寻找答案。发现民间传统艺术文化博大精深，想要了解并走进它们，就必须从理论实际出发去到田野间挖掘、发现、搜集、整理。

花灯非遗传承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

近年，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加之经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人们思维观念的改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思南花灯遇到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思南花灯不仅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遗产，它的存在不但是对历史名献的回演，更是传承先辈的不朽精神。新时代的来临让我们国家的众多古迹文化相继消失，成为我们永远的遗憾。思南花灯不同于其他艺术，他是一种集音乐、舞蹈和戏曲于一体的民族活动，随着人们越来越忽视对“古文化”的关注，使得它们逐渐从我们生活中消失。其最主要面临的困境有：



1. 后备人才不足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逐步提升,思南也逐渐走向富裕,在新的生活背景之下,思南花灯的原始意义很难再原封不动的保存下去,特别是 90、00 后的崛起,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下,对于思南花灯的了解很少。现在真正了解思南花灯民俗文化的是生活在村内的各个角落的传承老人,他们有可能是一个坐在巷口的年迈老妪,也有可能是地里种菜的老人。目前思南县中大多的年轻人为了生计都外出务工,也没有相对应的教育措施对于思南花灯的深刻内涵讲解,导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思南花灯表示不理解。

2. 政府部门不够重视

政府部门在思南花灯的保护和管理方面还有欠缺,这就造成了文化遗产的保护缺少保障。就拿思南花灯保护传承而言,当地政府没有进行过专业系统的学习,也没有更多吸纳当地专家,造成了外行领导内行的尴尬局面。最后,财政投入不足,对项目的扶持力度不够,在专项资金的使用监管上也存在一些漏洞,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有力的监督,导致了没能起到很好的效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不是最理想。另外,由于种种原因,思南花灯中的一些古代艺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导致了民间戏曲的消失,以及花灯艺术的衰落,许多有代表性的古典戏曲甚至已经消失无从修补查找。因此,传统的花灯艺术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这个结果的主要因素有:

3. 对花灯的误读与传承阻碍

21世纪后,本地居民甚至是外来居民,都对思南花灯的观念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例如:有些人感到与新的文明相比,传统的花灯艺术显得有些落伍,甚至开始自我否定,认为这种民俗很“土”,没有品位,与大剧院的艺术有很大的差距。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由于属于封建迷信,在花灯里的“请灯还愿”也遭到了一些冲击,因而在思想上也就出现了一些抗拒心理。

4. 灯传承人老龄化问题突出

在走访思南文家店、许家坝、大河坝、思林等 10 个乡镇及县城市区后,我发现:各片区代表性灯队(本地最具权威的花灯表演者,同时也是花灯传承人)的花灯队长几乎都已年过花甲,有的甚至已年过八旬。其产生的主要因素有:一、各个村庄的青年大多外出务工谋生,常年不回家,家里就剩下了年纪较大的独居老人,因此,花灯逐渐被年轻人所淡忘,只是作为老一辈人的回忆和生活。二是,尽管各个灯组都已年逾四五十,但大部分成员并未真正体会到传统的花灯舞台剧,有些表演技巧还不成熟,有时甚至无法代替主角登场。况且,以前的传统花灯舞现在也基本没有了,尽管总体上没有太多的改变,但在表现民间色彩上,还是少了很多。因此,思南花灯目前正处于步入老年、艺人断层、老一代传承人退出舞台表演的原始花灯形式的境况。虽然老一辈的艺术家也在培育新生力量,但是他们却只能从他们的口中,体会到他们的原汁原味,而不能体会到当时的意境和氛围。因此,思南花灯老一辈的艺术家,逐渐步入“高龄”。

表1: 思南非遗灯队队长年龄数据表(采集自 2021 年)

片区	姓名	年龄
思塘镇	王守权	78 岁
大河坝镇	文孝中	72 岁
思林镇	寇源	81 岁



片区	姓名	年龄
许家坝镇	许朝正	65岁
张家寨镇	罗实凡	78岁
大坝场镇	田建国	85岁
文家店镇	刘胜杨	85岁

花灯艺术大众推广过程中出现的“滋味”流失现象

在原有的传统灯会中，增加了新时期的舞蹈成分。近年来，新的节目也发生了变化，比如：在跳花灯的过程中，增加了一些演员，有的还会以六到十个人为一组（比如广场舞）。近些年，思南的传统花灯逐渐被人们所忽视，失去了传统的“味道”。原帮腔、说白、耍花枪等的情节被删去而没有表现出来，而众多的花灯由于其本身的诙谐、个性而显得生硬，在内容方面也呈现出了平铺直叙、循规蹈矩的特点。这一切都表明了当代艺术的影响下，传统的花灯文化正在成为一个全新的整体。思南花灯所面临的困境，提醒传统文化面临威胁，亟待传统花灯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思南花灯传承脉络及形式特征分析

笔者结合文献调研、现场访谈与观察，对思南花灯的一般演出程序进行了研究。从艺术人类学重视田野调查可以得到启示，考察一种民间艺术现象，需要将其看与生活、风俗相联系，将艺术的发生作为一个整体。在花灯形式的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只有了解了花灯演出的风俗、语境，读懂其动作、歌舞的内容，了解花灯的社会功能，才能更加准确地发现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的审美价值。者以正月玩灯的程序为例，对相应的仪式及过程做了梳理：

1. 点火起跑仪式。出灯的那一天，灯队的灯首向神灵请罪，在正殿的祭坛上祭拜。出灯典礼所需的各种灯饰（如：排灯、茶盏、鼓面、五角、扇面等）、一只公鸡、六根香、蜡烛、火炉等。在灯会负责人的带领下，在典礼之后，彩灯团队将会进行一场舞蹈的舞蹈。演出从乐器和伴奏的队伍中开场，以锣鼓为引，勾锣、槌子、大鼓配合，演奏出了第一个序曲，小丑旦在音乐声中登场，两人跟着节拍跳舞，开场后，丑旦在舞台上进行歌舞。

2. 灯队出门。“二人”灯做好后，队伍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巡游活动，在一名灯手的带领下，演员紧跟其后、其它几种灯、乐器伴奏组，和各组成员相继列成一队出门去。

3. 到主人家做客。当他们走进主家门时，首先要打个招呼，因为正门是关着的，所以灯队必须站在正厅门口，由里面的人用“盘问”（也叫“盘灯”），让灯组回答（也叫“盘灯”）。点亮灯笼，是屋子里的主人提出的问题，小头目在外面答话（也就是灯头），里面的人会打开房门接灯火，以示欢迎，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礼节。

4. 灯队入堂。走进正厅后，灯组就会开始表演，根据主人的需要和要求，分为坐堂和跑堂。出灯之后，就会一次又一次的走街串巷，一直持续到了正月十五。

5. 火种灯采集和点火仪式。在过了十五天之后，每年的十五，都会有一场盛大的庆功宴，所有的灯笼都会被烧毁，然后举办一场盛大的告别活动，而十五之后，他们还在这里表演，那就是一盏不要脸的灯笼。15号白昼为灯神预备，灯组所有参战者按照自己的任务在灯会前集合。道司大人穿着道袍，拿着一块牌子，站在大厅里，迎着灯火，跳起了舞，点燃了蜡烛，点燃了纸牌，又在宽阔的河岸和荒郊野外，将龙灯和狮灯团团围住，用灯油点燃，仪式完成后，将灯油熄灭，象征驱散疾病。而现在正是开春的时节，所有的人都将开始忙碌起来。

每年这个时候，没有一盏像农历新年的灯火那样繁琐复杂，按照历代灯会的主人所说，除了“耍花灯”之外，所有的灯会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许愿灯是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献礼的，一般婚礼上的灯会都是用来演奏的，并不需要太多的礼节。

花灯传承中的音乐遗产研究

灯会上的音乐包括表演者所唱的歌曲和所表演的音乐。灯光总是和音乐密不可分，而大部分音乐都是从民间音乐中继承下来的，从民间音乐中衍生出来的。在继承和发展地方民族的音乐元素的同时，融合了当地的侬文化，并吸取了外国戏剧的养分，从而使其具有纯朴、明朗、节奏感强烈的民族传统音乐。在旋律上很有特色，大多数的乐曲都是 2/4 的节拍，整体的旋律体现了鲜明的节律。它的声线伸展，曲子很长，很有声乐感，这在声部的旋律中是很常见的。整支曲调以演唱曲调为主。歌曲有：抒情诗（常用的是丝线灯），也有歌舞（常用的是铜锣和灯笼，在这种环境下，有很强的生活气息），都是抒情诗。

1. 曲调

作者从许朝正口中了解到，目前已有二百余种的苏州歌牌，五送郎牌，送手元牌，上茶山牌，采茶牌，四平牌，出台牌等。每个音符都是一成不变的，当人们创作新的乐曲时，往往要用旧的曲子来填补新的乐章，以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灯光的旋律，充满了个人风格，有动感，有节奏，有格调。以五音为主，以征、羽、宫调式为主，以商调为主。

2. 旋律与节奏

思南花灯舞旋律流畅，优美动听。在音程的提升上，很多曲子都是采用了跳跃式的技巧，有的跳跃三五度，有的跳跃四五度，有的跳跃七八度，有的跳跃七八度。这种独特的声程技法，给思南花上注入了浓厚的乡野色彩，也为它增加了乡间风情。在节拍方面，很多曲目都是以节拍为主，善于运用节拍，平均 16 个节拍，加上前 16 个节拍。总体而言，思南花的曲调有时欢畅欢畅，有时又悲凉抒情，其极富诗意的曲调令人耳目一新。

3. 花灯中的乐器伴奏

彩灯中的伴奏主要有锣鼓和弦乐两类。又分为文玩和武玩。锣鼓（又称演奏台），主要以敲击器、马锣、敲锣、敲鼓等打击乐器为主，丝弦（也叫音场）器，通常以二胡为主要乐器。在花灯的演出中，主要有锣鼓和弦乐两种形式。前奏，间奏，尾三段由铜锣作为背景音乐。锣鼓声是以马的锣声为先，敲响第一声。二胡是弦乐的主要形式，以前还有土制的大管（或南胡）、小筒管等。在演奏弦乐时，第一个出场的是一种弦乐，接着是主角走上舞台，最后是整个乐章的结束。此外，还有拨弦乐、三弦乐、吹管乐、柳笛、唢呐等文场乐器。

花灯传承中的多元社会功能

大自然与人文造就了一方特色，思南花灯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萌生，壮大。思南的风土人情、和民族性格在它的血液里浑然一体。它具有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色，与本地文化息息相关。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从“认知、教育、娱乐、交际”等诸多方面的视角对众多的中西文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探讨。思南花灯也有一定的社会功能性，对它进行了大量的现场调研，和有益的探索和探讨。

1. 地域性

《晏子春秋》中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说的是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情况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了一个地方的特性。贵州的灯笼分为四个方向，分别是：东、西、北四个方向，各个地方的灯笼都有不同的特点。因其地域特点，思南



花灯会具有自身**特色**。将**思南的地理、文化、风俗、信仰**等融入思南大地，充分展现了这里的民俗风情。思南花的地域特色主要有：通过多方搜集材料，访问了许家坝的许朝正，罗时凡和许朝芬等一些传统的民间艺人所搜集到的信息，进行了剖析：

(1) 在乐舞方面，对土家傩剧、民歌、土家的摆手舞等进行了借鉴和发展。今天的灯会演唱大部分是当地的民歌和民歌，而在歌曲方面，大多是用当地的山歌和山歌作为主旋律，融合了当地的音乐，从而产生了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的花灯歌曲。同时，在思南土家族的舞蹈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 从民间的日常活动中选取的题材和表现方式。“灯子”这个词，是根据本地的风俗，而“灯”这个词，也是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学来的，比如“去”，“黑白”。其中也有使用衬字的用法，例如“嘛”、“曼”、“撒”等，具有很强的地方特征。思南花的特色和其所具有的区域特色是密不可分的。

(3) 用手绢作为招牌的工具。然后，依据刘胜杨的口口相传，参考思南地区的天气特征和民间传说，了解到思南盛夏酷暑，蚊子多，扇扇是一种消暑消暑、防苍蝇的必需品；以往，思南村的女人们，都会随身携带一块手绢，用以擦汗、擦手、擦脸等。主要是由于这种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以，扇帕的应用更加的普及，也更加的受欢迎。

2. 群众性（平民性）

中国有着 5000 年的悠久的历史，对雅乐最早出现在宋朝之前，而当宋朝的民乐开始流行之时，人们才开始广泛地接纳俗乐。表演艺术具有“雅”、“俗”和“善”的特征。然而，最引人瞩目的还是**思南花灯的流行特点**。从对灯词、念白的反复整理中得到的结果。

(1) 它的题材大都是从民间生活中来的，如《上茶山》、《五送郎》、《送别情郎》等，以反映人们的生活。

(2) 在角色的设定上，多数都是将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或家庭的故事，呈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下层的劳动者，即平民的日常生活。

(3) 在文字上，不管是歌词，还是口语，都使用当地的方言，符合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听众们并不觉得奇怪，很好理解，也很友好。在一定意义上，《诗经》具有抒发民情、表达民愿的功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3. 灵活性、即兴性

思南花灯在许多地方都具有极高的包容性，例如演出时往往没有场地的约束，随时随地都能即兴演出，无需搭建舞台，无需搭建舞台，无需地域，只需演出即可。除此之外，演员的工作安排也很宽松，比如一支队伍里的队员可以互相配合，可以弹奏丝线，也可以弹奏琴声，就连乐器也会弹琴，所以在演出的过程中，乐队经常会互相交换角色，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人，就会轮流弹奏两种乐器，例如鼓手负责击鼓和马锣，有些还会同时负责两种乐器，例如大鼓，在曲目上表现得更加灵活，例如，当一支队伍去一家演出，他们一般都没有预先安排好的曲目，而是会随着主人的需要，改变曲目的内容、曲调等，从而让客人满意。在使用衬字方面也相当的灵活，其精巧的精巧使思南灯在这一块地域上一一直屹立着，也造就了其勃勃生机。

4. 宗教信仰

爱德华和弗雷泽是杰出的人类学家，他们认为“巫术”是一种艺术的源头，而弗雷泽则认为，原始人的习俗、神话、仪式和信仰都源自于魔法。思南灯是一种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和浓郁的宗教色彩的民俗民俗。

而且，思南土著人多信仰神魔，崇拜先祖，祈求神明保佑。思南传统的灯会在庙宇的祭坛上举行，祭奠是在祭奠之前进行的，祭奠过程是以跪礼和烧香的形式，祭奠不同的神灵

和不同的仙人，同时还会高歌一曲，让人们朝拜。许多的花灯源于雒文化的熏陶，例如扫堂、扫刀等。例如，开门、拜神、求四神、十二园姐妹等等，都是很有宗教意味的。这种表现方式既反映出思南族崇尚神灵的神秘与迷惑，又表现出民众为了求福缘而取乐于神灵的心态，从精神层面表现出当地人民对神灵、仙灵的崇拜与依赖。一种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原始的、反映人的心灵寄托。

5. “潜移默化”的教育性

就像美术的美学教育一样，思南花灯会在“以情感人”、寓教于乐的无声中达到了教育性的作用。从文家店镇的刘胜杨老人口中得知，当时很多人没有接受过文化的，20世纪的思南乡村，由于缺乏足够的交通和贫困。没有文化，没有历史。而且，他们所得到的很多史料，大都来源于民间的灯谱，民间的民间灯谱，则是历代文人前辈撰写的，其中有很多都记载了史书，或者记载了一些史书，或者说一些名人的事迹。通过学习花灯和欣赏花灯，让大家认识到了一些关于历史和文化的东西。

像《寸金难买寸光阴》和《劝进调》等乐曲，其主要的思想是讲礼仪、说教化，具有教化的作用。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在看这些歌舞表演的过程中，都能体会到礼仪和文明。在《李大回门》和《巧巧送饭》里，观众也学到了人性的善良和对错，因此被灌输了很多东西，让人懂得了善与恶，懂得了对错，学会了做人的道理。这从鉴赏中可以看出，鉴赏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启发和教育的。思南花灯会以感人肺腑、感人肺腑的强大的感召性，使欣赏对象自觉、不知不觉地接受和接受。

6. “乐者乐也”的娱乐性

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席勒在谈及美术的来源时，曾提出“游戏说”，他主张，“艺术”与“玩”是一种超越了物质与心灵的桎梏，对游戏的天性的追逐，不受社会的限制，是一种纯粹的审美行为，没有任何的实用性。这也表明了文艺表演中的娱乐功能。“乐者乐也”，这是孔子“乐记”中的第二十一节，也是一种乐事。思南花灯节，就是指人们在工作之余，寻求超越人生的心灵享受，以达到放松和娱乐的一种美学和游戏。在过去，这里没有大众传媒，没有游乐设施，交通不便，人们只能生活在附近的村庄里。在农业生产期间，人们都会想方设法使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舒缓和舒缓。于是，灯笼就成为了一种娱乐方式。因此，大部分的灯笼都带有诙谐、诙谐、滑稽等元素，在演出的过程中常常让人捧腹大笑。她所创造的活泼活泼的人物也使整个戏台充满了灵气和朝气，比如丑陋的外表，经常以滑稽的动作或滑稽的话语，扮女装、扮洋相，令现场的听众大叫一声，看着看着就觉得津津有味，同时又展现了大众的积极乐观。这种娱乐活动的内容，一般是在农民休息的时间，例如，人们会在春节后，将灯笼集中在一起，然后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让辛苦一年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疲劳，让这一段时间的休闲消遣，也让人们对人生多了一种期待。

对花灯传承谱系与活态发展的调研与分析

2015年，非遗发展首次由国务院提出，2016年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确定。“思南花灯”是全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定名录之一，自2016年以来，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从县级到市级一直到省级、国家级。近几年，“思南花灯”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相关部门在思南花灯的继承与发展上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然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这一使命是艰巨的，也是一种挑战，传统的思南花灯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才能使之得到有效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本文的核心问题。

作为“思南花灯”传承人，是思南花灯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是其得以延续的关键。本文作者与相关科研小组访问了全国传统文化遗产传承人刘胜杨老艺人，收集了他的职业经验



和传人衣钵，在他的传承基础上，对思南花灯今后的传承和发展进一步提出了一些见解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就其未来的发展作简要的阐述。

国家级花灯戏传承人——刘胜杨

与刘胜杨老人相识，多亏在贵州非遗研究基地考察时，正好赶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抢救工作，偶然发现刘胜杨的花灯剧，所以他也很幸运地参加了这次活动，去龙山村刘老爷子家里，和工作人员一同走访，进一步加深了对刘胜杨老人的了解。

从艺经历

刘胜杨，1936年1月出生于思南县文家店镇龙山村，从小就对灯笼有了很深的了解，直到今天，他的爸爸刘胜扬都是当地的一名农夫。未经学校教书，后自学成才，学习灯谜。在傩戏、花灯表演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收益。刘昌凡从事艺术70多年，刘家班第五代传人刘胜扬是他的第五位传人，至今已经有5个世代。1942年，刘胜扬跟着他的父亲学习武术，自1949年以来，他就经常在家里的灯台上表演各种古戏、花灯、傩戏，而且常年不间断。走马灯的演出很难看。少年时，他带领灯团到香港，广州等地演出。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是他对灯笼的喜爱却没有丝毫减弱，依旧率领着他的徒弟们在台上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彩灯秀。

作者从刘胜杨那里了解到，他被确定为全国传统的灯戏传承人后，其传承方式有四种：家族传承、民间传承、社会传承（学校传承）、以及发展的“灯艺”。

家族传宗授业：刘氏灯组在继承人的训练上，坚持了一种“男一女，女一女”的传统（古代“男一女一女，女一女不得在外面”的思想），于是，家里的男子只要是身强力壮，又想学灯艺的，都可以学，于是，刘胜杨刘家班的花灯队伍就由刘胜杨刘家班的花灯发展至今，仅有一名女弟子（改革后新招收），其余的都是男性，所以，刘家灯团的彩灯通常都是男女扮演，至今仍是男女扮成男女。在拜师的时候，如果是在家里，那么在正式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灯头，在柳家的香炉里，对着祖先们祈祷。刘胜杨的徒弟是刘胜杨爷爷的徒弟，有三个孩子，两个孙子。按照他的说法，他的二儿子是最好的接班人（他是个丑八怪，是个丑八怪），而他的三儿子则是个能工巧匠。现在，他正在为两个孙子孙女的子嗣而奋斗。

民间传承：刘家班收外人弟子，这是一种家族的传统，也是一种家族的传统。听刘先生的话，还有几十个在异国门下的门生，有些与他关系密切，有些则因为距离遥远而不常联系，他说，有许多门下最得宠的石登权、杨昌华（尤其是他扮演的是旦角）。他在招收弟子的时候，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是否对灯笼感兴趣，是否有危害社会的坏毛病（有劣迹的不得录用），优先考虑品学兼优、勤奋好学的学生。

社会传承（含流派）：刘胜杨在2018年成为思南灯会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人物，他也肩负着将自己的灯笼传给后人的使命和使命。他也接到了一些委托，经常去乡村中学、乡镇，乃至县城的中学讲授，在校园中推广灯笼，使之变成一种文化。此外，还定期与周边省市的花灯艺人进行交流、取经等交流。

为了让刘胜杨能够继续发扬传统的传统技艺，国家文化局将每年奖励他两万元的资金，并将其列为国家级的继承者。同时，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人”，也在“贵州省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刘胜杨是获得了国家文化部长的认可，成为了其中一位。通过这种方法，既能促进发展，又能反映出发展的目标，从而进一步弘扬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结论及建议

结论

非遗文化“思南花灯”是思南人民智慧的结晶，展现了思南人的精神风貌，风土人情，彰显了思南人的个性，是乌江河畔一枚闪亮的明珠。其深厚的人文内涵是极富历史与人文价值的学术资源。从文物的保存和艺术经济的角度出发，对思南花灯的艺术价值和它的继承和发展有了较深刻的阶段性的理解：

首先，思南花灯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民族特色的地方传统灯会。其形态和内涵充分体现了地方的特点，体现了文化的魅力。在旅游开发中，应采用动态的保护战略，将传统民俗与民俗习俗相结合，注重生命气息的传承，与旅游观光旅游发展相结合，构建一个有机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地方的历史和传统的文化内涵不能被剥夺。

其次，作为民族民间音乐和舞蹈的一种形式，它具有独特的音乐表演特征，是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由于传统音乐、舞蹈、风俗等自身特点，在当地民俗舞蹈发展与传承中，要采取各种形式的抢救措施，特别是采用数码技术，使传统的技艺更加生动、更加完整。

再次，一方的文化反映了一国的民情，而另一种文化又给本地传统文化提供了好的发展契机。所以，思南花灯具有旅游、教育等社会功能。尤其是对其特殊的教育价值，应大力推动思南花灯文化遗产在本地各大专院校的发扬和在学校设置与之相适应的学校美育教育。

最后，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是新时期应该大力倡导的行为，继承和发展思南花灯是重中之重。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必须遵循标准化的发展程序，立足现实，全面挖掘、整理和研究思南花灯。同时，要强化对“活”的研究，必须要充分认识“活”与“活”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活”的继承与发展。对思南花灯的文化进行剖析和探讨，目的在于引起人们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发展。希望这件文化瑰宝在贵州思南的发展中，会越来越灿烂，越来越辉煌。

笔者通过对“思南花灯”这一极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探索其传承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思南花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发等方面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和参考价值。

建议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文化是人类所积累的物质与精神的综合。民族文化是各个国家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物质与精神上的结果。思南花灯会是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以其旺盛的生机和独特的艺术韵味，成为一代代思南人在这块大地上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的精神依托、民族信仰、民族灵魂的载体。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时期的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原有的某些文化要素已经消失，出现了传统的“断层”，并面临着“消失”的危机。在此背景下，思南灯的发展尤其具有意义。

有效管理，积极行动

思南花是贵州省第一批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单位，近几年，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都十分关注，特别是近几年，为了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大力弘扬和弘扬中华文化，把贵州省的传统文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让人民群众把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传承下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司南花灯节是我国的一项重要传统戏曲类型，其发展与继承已成为当务之急。

要保持思南的历史回忆，把故乡的情感与“乡愁”保留下来，把思南的花灯作为一种文化艺术，这是一种凝结了祖先智慧的文化艺术。高效的发展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考量。



重点发展，专人专管。

有关部门要成立专业的照明产品研发部，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和技术标准。挑选那些对灯笼比较了解的人来进行经营。并可以由地方知名的民间灯谜学者对其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达到了灯管专用、材料多样化的目的。

加大花灯宣传力度。

在推广和发展思南花灯艺术上，要积极推广花灯，开辟花灯展览栏目，开展“花灯文化走进学校”、“从娃娃抓起”等项目，每年定期组织举办花灯艺术节、花灯比赛、闹花灯闹元宵等活动，鼓励乡里乡亲自发地开展花灯活动。同时，还可以与新兴旅游融合，建设“灯笼”文化的天然发廊，使之与旅游、艺术产业化同步发展。

扩收优秀花灯人才。

思南文化中心设有专门的彩灯培训班，以培训思南艺人中的佼佼者，平日里不定时地招募和选拔学生。要吸引更多的优秀花灯能手，可以扩大花灯的范围，比如聘请花灯传承人，选择农闲时节，培养花灯的专门技术人员或花灯爱好者，并根据不同的村庄，对其进行定期的训练和辅导。然后通过层层选拔，挑选出最好的灯笼。招生的次数也会增加。对入选的学生进行适当的资助和扶持，促进了学生们对“光明”的热爱。

花灯文化进课堂。

思南乡镇差不多都有好几个彩灯团，所代表的文化特点也各不相同。在学校里，要把灯文化引进学校，要经常请灯师到教室里讲灯，把灯的基本动作和要诀传授给学生，把灯的基础招式和要诀写在纸上，以便学生可以在学校里学灯、灯。思南城区的几个小学，都有了简单的灯笼课本，要扩大到整个思南的范围，让每个小学都能看到。让彩灯在每一个学生的心里消失。

与时俱进，高效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 2011 年二月二十五日在第十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公布，是为了传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加强保护和保护，将思南花灯节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法律上加以发展。《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条例》是贵州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符合《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规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条例》。为此，有关部门在有关法规的保护下，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保护。思南花是全国首个项目，当然是要大力发展的。一是要掌握好国家的发展方针，以数字形式进行思南花灯笼的开发，再利用现代大数据工业的方法来达到发展的成效；二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人”为载体，把握“人”，实现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保护。

做好花灯的数字化发展工作。

利用数字化技术对思南灯进行全面、完整的数字化收集和录制，采用声、视、图文四种方式。在文字上，本文从文献资料、文字资料和相关资料等角度，对灯文化进行了文字阐释。在图象上，以反映出思南人的文化特征为背景，以静止的方式呈现出典型的灯彩艺术形象，以更好的展示其生长的生态和特有的区域特征。采用录音、录像等形式，将传统的灯节和典型的舞蹈形式全部纳入其中。这样既能使传统的传统工艺得到长治久安地保存下来，又能为后世子孙了解和了解它的真实资料。

各有关部门要对灯的唱腔、形式、种类、传承人的录入、录像的收集等方面进行统计，并将其分类、分类保管。



不失时机地实施抢救性记录传承人。

为了落实和发展民族文化，挖掘和整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研究、整理、编纂，最后将这些成果永久地保留，国家文化厅于 2020 年提出了“抓文化这个人”，强化对继承者的培养，推动其文化的活态地传递，并进行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的工作，为了进一步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刘胜杨是全国非遗项目，他是全国首个被发现的文物。这项工作以口述文稿、搜集文献资料、非遗传承人回顾等，将传承人对传统节日的了解、对自身的技术和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同时，通过现代化的数码和多媒体技术，为后人传承、研究、宣传和利用相关资料，全面、系统地记录和记录灯展的历史和现实。

不断挖掘，鼓励更多人研究。

随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日益关注，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工艺--“思南花”受到众多专家和学者的青睐。他们在发掘思南花灯节的历史、人文历史、人文历史等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激情。对于有关部门而言，开放门户，让更多的聪明人去学习，这对于思南人而言，也是一种可喜的事情。同时要充分合作，尽量向研究工作者传递情报。如此一来，这些珍贵的研究结果就会被收录在花灯的档案库中，而关于思南花的信息也会逐渐的变得更加的丰富。

无论是数字化地录制思南灯，抢救它的继承者，或者提倡更多的人去学习它，这些都是对这个传统的发展。同时，也标志着思南花灯节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更多地为人们所熟知，使其具有的社会和历史和文化意义得以展现。

本文着重探究思南花灯在当代社会中遇到的问题，如传承人断层、后继乏人、演出市场萎缩等现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希望能够引起更多有识之士对思南花灯的关注和重视，使之得到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要想让思南花灯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下去就必须加强政府扶持力度，培养后继人才，建立完善的传承机制等措施来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现出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民间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 王子毓. (2019). *口述史语境下山东淄博地区非遗舞蹈“踩寸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博士论文]. 山东大学.
- 王依斌. (2020). *民间舞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的传承——以长穗花鼓的继承与传播为例* [博士论文]. 辽宁师范大学.
- 王鸿昀, & 韦舒馨. (2017). 天津地区民间舞蹈传承发展研究.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3), 10-13.
- 田永红. (2007). 谈傩戏与花灯的异同关系.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6), 29-32.
- 林友. (2019). 苏州地区民间舞蹈保护现状调查研究. *艺术评鉴*, (11), 3-5.
- 金光亿. (2009). 艺术与政治: 20 世纪 80 年代韩国的民族艺术运动.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 4-5.
- 屈丽蕊, & 高飞. (2013).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生态观与生态文明建设. *科学发展·生态文明——天津市社会科学界第九届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下)*, 903-909.
- 宫崎清, & 张福昌. (1999). 日本传统工艺及保护振兴. *上海工艺美术*, (1), 8-9.
- 祝修明. (2009). 贵州思南土家花灯音乐的艺术特征探究. *歌海*, (5), 3-4.
- 高琪强. (2018). 论旅游开发对原生态民族民间舞的影响——以张家界土家族舞蹈为例. *黄河之声*, (18), 1-4.
- 郭静. (2017). 民间舞蹈产业化发展研究. *经济研究导刊*, (7), 2-3.



- 崔德虎. (2014). 关于黔东土家族民俗文化遗存的考察--以黔东土家族民间艺术为中心. *青海社会科学*, (4), 3-7.
- 阎晓箐. (2019). 地域文化背景下民间舞蹈艺术传承发展策略. *文化产业*, (24), 2-4.
- Ahmad, Y. (2006). The scope and definitions of heritage: from tangible to intangib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12(3), 292-300.
- Keitumetse, S. (2006). UNESCO 2003 convention on intangible heritag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heritage management approaches in Africa. *South African Archaeological Bulletin*, 61(184), 166-171.
- Kurin, R. (2004). Safeguard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2003 UNESCO convention: A critical appraisal. *Museum International*, 56(1-2), 66-77.
- Morsi, A. (2005). Research and preservation projects on intangible heritage. *Museum International*, 57(1-2), 61-66.
- Van Zanten, W. (2004). Constructing new terminology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Museum International*, 56(1-2), 36-44.



新加坡华族的身分认同: 从离散到反离散

SINGAPOREAN CHINESE IDENTITY: FROM DIASPORA TO ANTI-DIASPORA

徐耀雄^{1*}, 简瑛瑛²

Yao-Seong Chee^{1*} and Ying-Ying Chien²

^{1,2}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系

^{1,2} Department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yychien19@gmail.com

摘要

早在 10 世纪就有少数中国人在新加坡进行贸易或定居的记载，一直到 19 世纪中叶中国因鸦片战争的经济崩盘后才陆续有大量的中国人民来到新加坡这块土地上。根据新加坡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0 年新加坡共有 569 万人口，其中华族就占了 75.9%，可见当时的移民潮对于现今新加坡人口的结构有着重大的影响。新加坡华族的历史至今已有 100 多年，在这期间他们经历了国内外许多重要的事件，其中包括辛亥革命、二次大战、日据时期、英殖民时期、马来亚独立以及新加坡建国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新加坡华族的身分认同经历了从去国离乡的“他者”到建构自身主体性重塑文化身份的过程，即从华侨、华人到华族的转变。因此本文以三段不同的时期，分别是（一）1840 年鸦片战争；（二）1949 年中共建国；（三）1965 年新加坡建国作为叙述背景，各别对应到华侨、华人及华族三种不同的身分认同，并参照王德威教授所提出的“新加坡华语语系的十个关键词”来探讨新加坡华族的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离散到反离散的变化。

关键词: 移民 新加坡华族 身分认同 华语语系 离散

Abstract

Other than a few records in the 10th century of Chinese trading and settling in Singapore, it was not until the mid-19th century that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people came to Singapore after the economic collapse of China due to the Opium War. According to data released by the Singapore Bureau of Statistics, as of 2020, Singapore has a total population of 5.69 million, of which 75.9% are ethnic Chinese, which shows that the immigration wave at that tim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ake-up of Singapore's population today.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Singaporeans covers more than 100 years, during which time they have experienced many important events at home and abroad, including the Xinhai Revolution, World War II,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the British colonial period, the independence of Malaya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gapore, etc., in which the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Singaporean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of reshaping cultural identity from the "other" who left their home countr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own subjectivit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namely: (i) the Second Opium War in 1860; (2)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in 1949; (3) The founding of Singapore in 1965 as the narrative background, corresponding to the three different identities of Singaporean Chinese, 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Ten Keywor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Family in Singapore" proposed by Professor David Der-wei Wang, to probe the changes of Singaporean Chinese from diaspora to against diaspora.

Keywords: Emigrant, Singaporean Chinese, Self-identity, Sinophone, Diaspora



引言

新加坡在很早的时候只有少数的华人前来居住。直到 1819 年新加坡开埠后，才吸引了不少来自檳榔嶼、马六甲以及邻近荷属殖民地的华商和华工。到了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大量闽粤地区的人民不断涌入新加坡，成了新加坡华人当中的主要群体，而这一群体便是本文所论述时期（1840-1948）内认同中国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的华侨。

二战后，因英殖民统治者的背信导致抗日失败，华侨对于英政府的态度已大不如前，他们开始争取公民权益，要求在政权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希望新加坡有更大程度的自治空间，于是进入了反帝、反殖的斗争当中。新中国於 1949 年成立，英殖民担心共产势力的渗透便切断了新加坡与中国两地的往来，这更是大大地促进了华侨对于当地的认同。随后中国於 1955 年与印尼签订的避免双重国籍协议，解除了英殖民政府对华侨获得公民权后出现双重国籍的顾虑，便通过了法令让华侨获得公民身份。本文所论述时期（1949-1964）内的华侨虽然仍坚持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但是所关心的政治、文化及教育等议题已慢慢地从中国那块土地转移到新加坡这块土地上，并且还获得了新加坡公民的身份，因此笔者以汪洋（1998）所定义的“华人”一词来替代“华侨”。

1965 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后，政府制定了“英语至上”的双语政策，透過英语來团结、凝聚国人，建立国家、国民与民族的认同基础。随着国家认同和国民意识的深化，大部分华人会先认同自己为新加坡人，而在民族的认同上才是华人。因此，本文所论述 1965 年新国独立后的时期皆以“华族”一词取代“华人”。

内容

研究背景

新加坡虽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建国至今仅 57 年，但却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新加坡的成功离不开它的历史背景和国家政策，而这些背景和政策同时也对新加坡华族的离散意识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自 1840 年中国因爆发鸦片战争而导致经济崩盘后，大量的中国人被迫到海外谋生，其中一部分的人便来到了当时受英殖民统治的新加坡。尽管他们不满清政府的作为，但却热爱着中国那块土地，惦记着他们亲爱的家人，所以大部分的人都仍然希望有天能够回到祖国去，因此新加坡对于这些人而言只不过是一个工作之地。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殖民政府担心共产势力渗入新加坡，便切断了两地之间的往来，这时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国人回不了祖国，也无法轻易掌握及了解祖国的动向，对于回国的期望更是渺茫，就在这个时期新加坡华族的离散意识便开始产生了变化。到了 1965 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取得了自治权后，政府所实施的“英语至上”政策获得了极高的成效，语言的共通性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金注入新国，经济、股市和贸易皆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新加坡华侨选择了安定下来，开始在地化，致使投注在定居地的社会心理情感渐渐增长，直至盖过对于原乡的眷恋，最终结束了多年来的离散状态。

本文将以前段所述的主要事件，分别是（一）184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二）1949 年中共建国；（三）1965 年新加坡建国，三个不同的时期作为叙述背景，分别对应到华侨、华人及华族三种不同的身分认同，并拟参照王德威教授所提出的“新加坡华语语系的十个关键词”：1.《叻报》2.儒教 3.南洋大学 4.南洋华语文学 5.多语剧场 6.新谣，同时搭配历史、政策、文学及艺术作品等来探讨新加坡华族的离散变化。

研究理论

“离散”一词系从希腊文“Diaspora”翻译而来的，指涉那些被迫或主动离开家园故土，生活于异地的人群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作为移民研究的一种视角和理论框架。赛峰（William Safran）认为离散者的特点如下：从中心到边缘的散居，家园记忆和神话，在东道国的疏离感，渴望最终回归，进行式的对家园的支持，被这种关系所定义的集体身份。

史书美（2011）则不谈离散，而谈“反离散”。她认为作为一个 Sinophone 或华语语系的主体，无须永远沉浸在“花果飘零”的情结里，而应该落地生根。换句话说，与其谈离乡背井、落叶归根，更不如寻求在所移居的地方重新开始、安身立命的可能。

由于政治或经济因素使然，百年来大量华人移民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他们建立各种社群，形成自觉的语言文化氛围。尽管家国离乱，分合不定，各个华族区域的子民总以华语作为文化遗产的标记。但当我们正视半个世纪以来新加坡这个国家所形成的华语文化经验和记忆，我们得出不同的谱系。尤其当代海外华语文化蓬勃发展，“中国”或“中文”一词已经不能涵盖这一时期人文生产的驳杂现象。在全球化观念的激激盪下，我们对国家与文化间的对话关系，应该作出更灵活的思考。基于这样的理念，王德威提出十个“关键词”作为思考华语语系的人文研究与新加坡文化互动经验的切入点。

饶芃子（1998）提出由于海外华文作家有着不同的经历和背景、不同的时空及语境、不同的文化和环境，我们无法以一种常规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和看待他们。“身份”就成了我们切入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角度。（简瑛瑛/廖炳惠 2015）因此，本文拟将新加坡华人分成早期的华侨、后来的华人到现今的华族三种不同的身份来进行研究。

华侨时代

从 1860 年代至 20 世纪初，出现以中国劳工为主体的海外移民潮，也有部分中国人以自由劳工的身份前往东南亚从事商业、手工业与农业活动，其中就有一大部分来到新加坡。这些在外地谋生的中国人，我们称之为“华侨”。颜清湟认为这时期的新加坡华侨社会主要认同中国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的文化传统。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新加坡华侨社会经历了一个从“马来化”、“英化”到“再华化”的过程。新加坡华侨的“再华化”不仅是关乎文化的，也是关乎政治的。在文化方面，主要表现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追寻，具体包括讲中国话运动和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而在政治方面，主要表现在对中国政治的强烈关注与积极参与，并在对中国改革与革命运动的回应中形塑了新加坡华侨的民族主义情感。本节就王德威教授所提出的《叻报》和“儒教”两个关键词及辛亥革命来探析新加坡华侨离散及落叶归根的意识。

1. 《叻报》

从 19 世纪末期到 20 世纪初，新加坡华社中出现了重振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华侨离开中国本土，远渡重洋到新加坡工作生活，难免受到当地马来文化及英殖民文化政策的影响，因此许多华侨开始强调遵循中国习俗，过中国传统节日。有人组织了中国文学社，传播中国文化，还有人在华侨青年中发起“讲中国话运动”。所有这类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当时的尊孔运动。史学家颜清湟把这些现象都归于“海外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叻报》便是应运这样的社会文化而成立的。

《叻报》由薛有礼于 1881 年创办，1932 年停刊，总共刊行 52 年，其目的在于“开启民智及推广中华文化”，是新加坡创办最早、发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被誉为“南洋第一日报”。《叻报》作为新加坡华侨创办的报纸，具有鲜明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内容除了报道新加坡当地的社会状况，还让当地侨胞得以了解中国国内的新闻动向，同时也将自身看作



传统文化的载体，把中国有关信仰、节日等民俗观念传播给在地华侨。因此，尽管华侨与祖国远隔重洋，彼此却一直保持着紧密的文化认同。

2. 儒教

儒家教育及其两千多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和发展的根基。19世纪90年代，新加坡的华族知识分子，受到中国维新思潮的冲击和康有为创立孔教的启发，在本地复兴儒学、设立儒教，一则响应康有为为配合维新事业而进行的政治化孔教运动一则按照当地华人社会改革需求而展开富有文化寻根意义的儒教运动，其中最关键的人物便是林文庆博士。

林文庆是出生于新加坡的海外华侨，终其一生于儒教的研究和宣扬。他在新加坡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倡导儒教，希望改变当地华侨的风俗习惯，学习孔子的思想，成为文明人士，同时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的知识。儒教的推动，不仅能够拉近新侨与中国之间的距离，还能强化他们对于中国历史、乡土、民族和文化的认同及归属感。

3. 辛亥革命

革命期间，新华侨为帮助家乡应对动乱，组织力量自卫，透过《叻报》向华社发起募款，获得热烈响应。在海外侨胞的经济支持及革命同志的努力奋斗下，中华民国于1912年正式成立，建立起民主共和政权，中国社会民气大开，海外华侨备受鼓舞。新华社会对中国本土的认同和效忠程度空前加深，热烈、执着地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跨越帮界的全社会国民捐和响应宪政侨务政策选举华侨议员回国参政成为此一时期华侨社会政治的新气象，华侨义务与权益得到高度集中的统一。

华人时代

根据汪洋（1998）对华人一词的定义系指丧失中国国籍，已取得或尚未取得他国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的定居国外的中国移民及后裔。笔者在此一概念上进而延伸所谓的“华人”系指仍然坚持着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但是所关心的政治、文化及教育等议题已慢慢地从中国那块土地转移到新加坡这块土地上。新加坡在1942至1945年被日军占据，直到二战大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才把政权交还给英殖民政府。新加坡华人在经历这场侵略之后，对于英政府的态度已大不如前，他们要求在政权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希望新加坡有更大程度的自治空间。可见这时期的华人已经开始关注新加坡本土的发展，积极争取自治权与话语权。1949年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英殖民政府担心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势力渗入新加坡，便切断了中新两地之间的交流，这更是大大地提高新华对于本土发展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本节就王德威教授所提出的“南洋大学”和“南洋华语文学”来进一步分析新加坡华人离散意识和身分认同的转变。

1. 南洋大学

早在20世纪初，新华依凭社会经济实力纷纷投资兴办华文学校，积极推广华文教育。由于新加坡当时并没有大学教育，因此中学毕业后的学子会选择到中国继续深造。然而，在1949年中共建国后英殖民政府为防止共产势力与思维的深入便实行了阻断新马与中国大陆往来的政策，使得新马地区华文学校的师资来源及高中毕业生的升学渠道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进而引起华社高度关注及重视，纷纷提议创办本地的华文大学。经过困难重重，南洋大学终于1965年成立起来。

南洋大学是中国海外第一家华文大学，其表现了新加坡华人对于华文教育的期望及民族认同感。南大时期，新华文学的创作富有活力，亦逐渐显现出本土性的倾向，即从早期的“附庸中国”逐渐转变成“归化当地”。尽管南大仅成立24年就被政府施压而被迫改制，但其对新华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涉及南大书写的华文文学文体广泛、数量丰富，从散文到诗歌、从微型到中篇，可谓比比皆是。

2. 南洋华语文学

南洋华语文化与一般移民、殖民地文化最大不同处，在于华人有意识的赓续传统，并且坚持不懈。方修以史笔记录、见证华语文学在南洋的流变，一方面呼应中国文史一家的传统，另一方面却也标明南洋文学自外于“中原”、“正统”的视界。方修从事诗词、散文和杂文的创作，同时对新马文学史具有深入的研究，《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便是其代表著作之一。方修提到新华文学表现出自立和自强意识，虽然早期受到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新华文学毕竟在政治、制度、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及民族组成等都与中国不同，所以新华文学终究会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道路，不会永远“附庸中国”。

华族时代

新加坡于 1965 年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华人人口虽然占绝大多数，但仍有大约 15% 的马来人及 9% 的印度人以及少数的其他种族，他们构成新加坡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过去共同的殖民地统治和相同的移民经历，而非相同的种族、文化或宗教背景。在这样多元语言文化的环境下，新加坡政府制定了“英语至上”的政策，透过英语来团结、凝聚国人，建立国家、国民与民族的认同基础。因此，在这个时期不管是文学或艺术等作品都聚焦在新加坡社会现象、文化与身份认同等议题上。王德威教授所提出的“多语剧场”和“新谣”便是本节拟探讨的主题内容。

1. 多语剧场

作为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新加坡也拥有不同语言的剧场：马来语剧团、英语剧团、华语剧团等，剧作家郭宝昆则是在关照新加坡这样的多语文化情境之下创办了多语剧场。其创作的第一部多语剧本《寻找小猫的妈妈》，也是新加坡第一部跨语言和文化的戏剧，结合了英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以及华族的各种方言像是粤语、福建语、客语、海南语等几乎新加坡社会所使用的语言都融入到了剧本当中。此外，剧中的句式也套用了新加坡国人日常说话时的的语码混杂及转换的表达方式，展现出新加坡多种族共同生活的真实情况。



图 1: 《寻找小猫的妈妈》

来源: Cheryl Wee (2012) <http://cheryl-wee.blogspot.com/2012/09/blog-post.html>

《老九》则是另一部郭宝昆有名的多语剧本创作，内容主要讲述主角老九是家中唯一的男丁并且排行最小，因此父亲对他强力栽培且寄予厚望，但老九却想要追逐自己的梦想，故事就在父亲与老九之间的互动发展开来，正好象征了现代与传统、现实与理想的二元对立。剧

中语言混杂，一句话可以夹杂两、三种语言，像是“你请假，我 ponteng，怎样赚吃？”（ponteng 是旷课、旷职的意思）（赚吃是福建闽南用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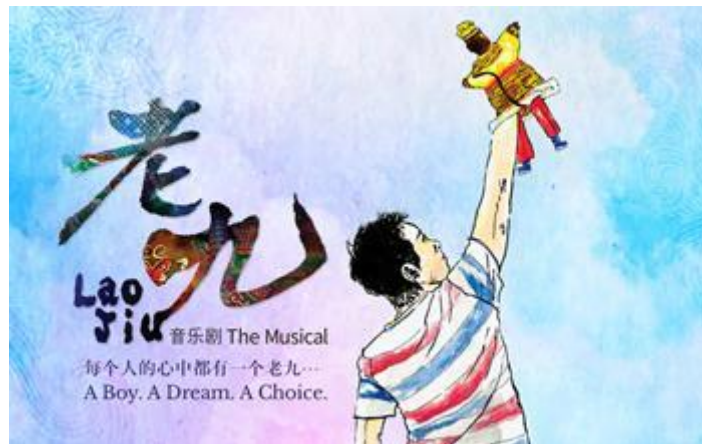


图 2: 《老九》

来源: 实践剧场 (2017) <https://practice.org.sg/zh/lao-jiu-the-musical-cn/>

郭宝昆曾说过：“文化不论是二元或多元，越往深处想，你其实越会发现它们之间是相通的，而且层次越深，联系就越紧密；越是停留在肤浅的层次上，就越显得分离。”其曾自称是“文化孤儿”，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剧本集取名为《边缘意象》，显示了他对于自己处境的体会，以及对于新加坡文化现状的了悟。虽然新加坡并不处于任何源远流长的文化中心，却是中华、印度、回教与欧洲等伟大文化汇集的地方。郭宝昆便是将这些语言和文化融入戏剧当中，意图创造出一个新加坡本土的多元文化，建立一个属于新加坡人民的身份认同及文化意识。

2. 新谣

1970 年代，台湾兴起的校园民歌风气吹到了新加坡，鼓动了当地“唱自己的歌”的呼声，“新谣”便是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应运而生的。新谣是新加坡民谣的简称，关心的是新加坡社会现象、族群、文化与身份认同等议题。新谣的重要人物包括巫启贤、黎沸辉、颜黎明、潘盈等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第一届《青年艺术家奖》的得主梁文福。

梁文福作为在新加坡这个建国不久、文化根基不深的国家土生土长的公民，其关心的是新加坡移民心态以后的文化与身分认同的问题。像是这首于 1990 年创作的《麻雀街竹枝》唱的便是一种民族情怀、身份认同与爱国的情操。麻雀街竹枝筑巢，有个安乐窝，对于创作者而言，新加坡是他的家，他的根。歌曲具有浓厚的自传及本土色彩，引用童年记事勾勒国家的发展。所提及的海山街、竹脚、小坡、四马路等街道俗称是新加坡人惯用的本土语言，含草根特色，听起来无比亲切。无奈当时新加坡政府推行“讲华语运动”，遏制方言的发展，歌曲中的“我阿爹系海山街住过”、“我阿妈系竹脚生我”和“小小麻雀担竹枝/都系担番屋企好得多”以广东话演唱，和“我表兄金山回来罗”用福建话说唱，所以当年歌曲发行时被禁播，一直到 2010 年才解禁。

另一首歌曲《新加坡派》唱的则是具体而微的岛国历史，歌词从第一人称的视角，看 1960 到 1990 年代，新加坡从无到有，发展成工商业社会的过程。歌词中说道：

爸爸说出世在六十年代 / 一岁多国家才算诞生出来
那时候没人相信新加坡牌 / 还有人移民海外

早期的新加坡属于马来亚的其中一州，后来因政治缘故而独立建国，那时候澳洲和英国报章都评论认为缺乏资源的新加坡独立之后将走投无路，甚至还有许多新加坡人民因对国家未来感到迷茫而在独立之后纷纷移民海外生活。

渐渐地我们进入七十年代/一穿上校服我就神气起来

裕廊镇烟囱个个有气派/比我长高得更快

总理李光耀认为，在资源匮乏的新加坡，若要生存，就只能仰赖工业化，因此，把原是一片沼泽森林区的裕廊镇填平疏导成为工业区，后来甚至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工业区。新加坡英语至上政策开始奏效，国人良好的英语沟通能力不仅使得新加坡产业得以与国际接轨，让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起来，同时也促进了国人之间的交流，摆脱了早期社会各族语言不通无法交流的情况。

一晃眼已经来到九十年代/爸爸你再唱一遍往日情怀

我们的故事我们自己记载/未来就看下一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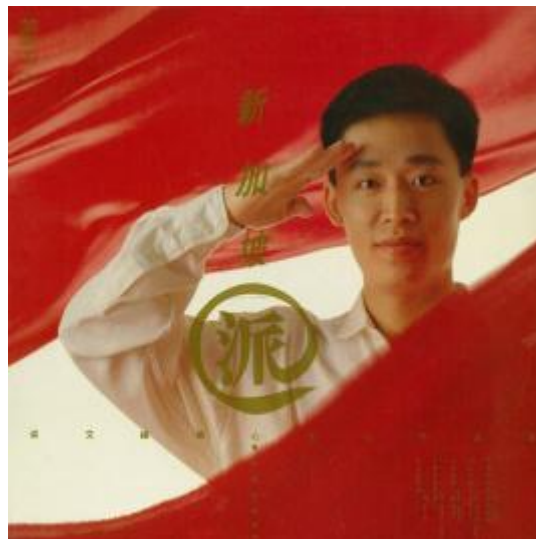


图 3: 《新加坡派》

来源: 百度百科 (2022)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6%B0%E5%8A%A0%E5%9D%A1%E6%B4%BE/17630826>

先辈们从早期外来者身份一路奋斗至今成为新加坡的主人，而国家未来的发展则寄望在下一代的身上。因此，在这样多元语言文化的环境下，新加坡政府所制定的“英语至上”政策，透过英语来团结、凝聚国人，建立国家、国民与民族的认同基础对于新加坡的发展可说是非常关键性的。

结论与建议

新加坡华族自早期的离散及落叶归根到现在的落地生根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从早期的《叻报》对于中华文化的宣扬及儒家教育的推动可以看出当时离散及落叶归根意识强烈的新加坡华侨希望中华文化及教育之优良传统得以保存及传承，并试图在西方殖民文化及马来土著文化的大环境下确立自我精神存在的基点。另外，辛亥革命后的新加坡华侨其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对民族自尊的恢复以及对历史文化的自信充满了整个华侨社会。可以说，这时期的新加坡华侨社会基本上延续了一种根植于祖籍地历史文化的乡土认同。新加坡对于他们而言只是一个定居



地，一个有利可图的贸易中心，总有一天，终究会荣归故里。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加坡华侨的离散意识及身分认同开始出现了转变。不管是语言、文学或教育，其中国性和本土性在这个时期开始产生了融合，并逐渐发展出一套属于新加坡本土的体系。到 1965 年新加坡独立建国后便全力推行“英语至上”政策，以新文化超越多数族群语言文化，拆除各族之间的藩篱，以英语为核心大力发展工业化与国际贸易，以各族母语为辅传承语言和文化，保留各民族对自身的认同。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在 1978 年说过：“我们不能失去文化的根基，我自己过去就差一点失去文化根基，因此我知道这种危险性，一旦失去文化根基，人就会失去信心，就会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可见，政府希望在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尽可能保存及传承民族语言文化，像推行多年的“讲华语运动”及 2017 年政府出资成立的“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都可看出这方面的用心。

现今华人文化并没有在新加坡消失，而是不断地与各个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相互交融，进而发展出一个属于新加坡本土的文化符号。这时期的华人在国籍身份上，他们成为新加坡人，而非中国人，但在民族的身份上，他们依旧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后代。李显龙总理曾说过：“不论是原住民、新住民，不管祖先已来新加坡几百年，或是刚来几年，大家都应该珍爱这块土地，在这里打拼。就像树木一样，唯有落地生根才能成长茁壮成为大树”。新加坡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丰富的语言文化一直不断地在此交汇，政府对于母语教育和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决定着新加坡华族身分认同的发展趋势。从早期的“华侨”到建国后的“华族”，可发现新加坡华族身分认同的转变和华文教育的发展有着程度上的关联。因此，新加坡华族的身分认同是一个值得持续深入关注、研究的议题。

参考文献

- 姜照.(2021).*1911-1916 年转型期新加坡华侨社会变迁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侨大学.
- 简瑛瑛, & 廖炳惠主编 (2015). *跨国华人书写. 文化艺术再现*.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出版中心.
- 柯思仁.(2000). 新加坡实践剧场. 新加坡当代戏剧巨匠郭宝昆. *表演艺术 Performing Arts Redefined*, 91.
- 蓝峰.(2019). 新加坡《叻报》: 早期流散传媒的话语特征及华族身份构建. *文学人类学研究*, (2), 184.
- 李元瑾.(2005). 从新加坡两次儒学发展高潮检视中国、新加坡、东南亚之间的文化互动. *中国哲学史*, (3), 124-128.
- 李育霖.(2020). *华语语系十讲*.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饶芃子.(1998). 海外华文文学的新视野. *社会科学家*, (2), 55-59.
- 史书美.(2017). *反离散: 华语语系研究论*.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史书美.(2011). 反离散: 华语语系作为文化生产的场域. *华文文学*, (6), 5-14.
- 王德威.(2014). *华夷风起: 华语语系文学三论*. 国立中山大学出版社.
- 王德威.(2014). 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与新加坡经验: 十个关键词. *华文文学*, (3), 5-20.
- 颜清煌.(1991). *新马华人社会史*.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
- 朱崇科.(2016). 如何中华文化, 怎样本土文学?--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华人文学与中华化研究论纲.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4), 158.
- 張晨儀.(2021). 從“馬來化”“英化”到“再華化”--以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新加坡 土生華人為中心的考察. *世界民族*, (3), 89-100.
- 周加李.(2006). 李光耀的文化认同与新加坡现代化的文化选择. *南洋问题研究*, (2), 64-70.
- 周泫岐.(2019). *新加坡《叻报》的中华民俗观念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河南大学.